

总第36期
2015年06期

学准则 守纪律 以新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工作

坚持“三个自觉” 服务中心工作
奋力谱写攀枝花党史工作新篇章

20世纪末四川扶贫攻坚（1978—2000）（下）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中共四川省委十届七次全会举行 王东明作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1月16日至17日在成都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6人，候补省委委员15人。省纪委监委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东明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改革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决定》。



中共四川省委十届七次会议在成都举行。四川日报记者 毛漫丁 田为/摄



过去五年是四川极不平凡的五年，面临严峻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考验，多重困难叠加、多重任务交织。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省情实际和发展阶段，提出实施“三大发展战略”、推进“两个跨越”，对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分别作出决定，形成了全省工作总的格局；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兴省之要，全省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全省经济结构出现可喜变化；坚持提升首位城市、着力次级突破、夯实底部基础，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做强市（州）经济梯队，点多多极支撑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着力改善发展条件，建成了一批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骨干工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农业农村、国资国企、简政放权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一批重大高端、现代产业项目落户四川；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实施民生工程，坚持每年办成一批民生大事实事，聚焦“四大片区”打一场扶贫攻坚硬仗，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鲜明提出“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治”，制定实施依法治省《纲要》和《决定》，坚定把四川各项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态总体形成。五年来的巨大成就，为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自2015年1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2015年06期

/总第36期

主管主办: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名誉顾问:

谢世杰 秦玉琴 陶武先 席义方

顾问:

陈荣仲 吴得民 卢耸岗 赵庆东
罗宗荣 张继禄 彭亚新 龚自德
王庭科 彭穗宁 王光华 侯德邻
张国新 鲜于浩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承先

副主任:

李文星 江红英 郭生春 宁志一

委员:

周锐京 戴忠东 王皓 杨吉成
魏家骏 彭本瑜 邱俊 江红颖
谭洪明 唐广生 向道泉 余崇威
雷家兴 唐宗政 李勇 侯立新
蒋吉平 师伟 徐永利 秦后权
肖飞 张敏 尹克发

封面:

阿坝州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内雕塑——前仆后继

封二:

中共四川省委十届七次全会举行

王东明作重要讲话

封三:

①省委党史研究室传达学习省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

②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三严三实”专题学习报告会

封底:

安宁河畔新家园

卷首

01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摘选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04 学准则 守纪律 以新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王承先

08 领导干部应该多学习点历史——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摘编》有感

/陈松

专题研究

10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工作

/郭生春

15 中共内江党组织对抗战胜利的贡献

/余崇威 吉腾久

18 抗战前期乐山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

/刘宗灵

史海钩沉

24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转战川滇黔

/颜林

27 德阳早期工业区建设的曲折历程及其分工协作经验

/杨倩

30 三线建设在万源

/王发祯

改革开放实录

- 34 20世纪末四川扶贫攻坚(1978—2000)(下)

/曾凡荣

学术动态

- 38 动员全川力量驰援全国抗日——评《抗战时期的中共四川组织》

/龚自德

工作论坛

- 40 坚持“三个自觉”服务中心工作
奋力谱写攀枝花党史工作新篇章

/熊伟

- 43 如何正确认识党史工作

/白冰

红色之旅

- 44 乐山市五通桥区

诗画党史

- 47 红军走过的大草原(诗组)

/李瑞琼

动态窗口

- 46 四川省革命遗址普查成果广元巡展启动仪式在旺苍县举行
中国红军城、木门会议会址被命名为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荣获“全国社科联先进学会”称号
绵阳举行纪念红军长征入川8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共通江执政实录》(2009—2013)出版问世
达州市达川区率先开通党史微信平台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刊名题签：何应辉

编辑出版：

《四川党史》编辑部

责任编辑：

蒲志明 马睿 李晓聪

美术编辑：

《廉政瞭望》杂志社

-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商业后街3号
- 邮编：610031
- 电话：028-86603140
- 传真：028-86603140
- 电子邮箱：scds.2007@163.com
- 网址：www.scds.org.cn
-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 印刷单位：四川川林印刷有限公司
- 印刷日期：2015年12月
- 印数：2000册
- 发送对象：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各省（区、市）党史工作部门，全省各级党史工作部门，省级各机关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学准则 守纪律 以新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文/王承先

一、深刻理解修订《准则》《条例》的时代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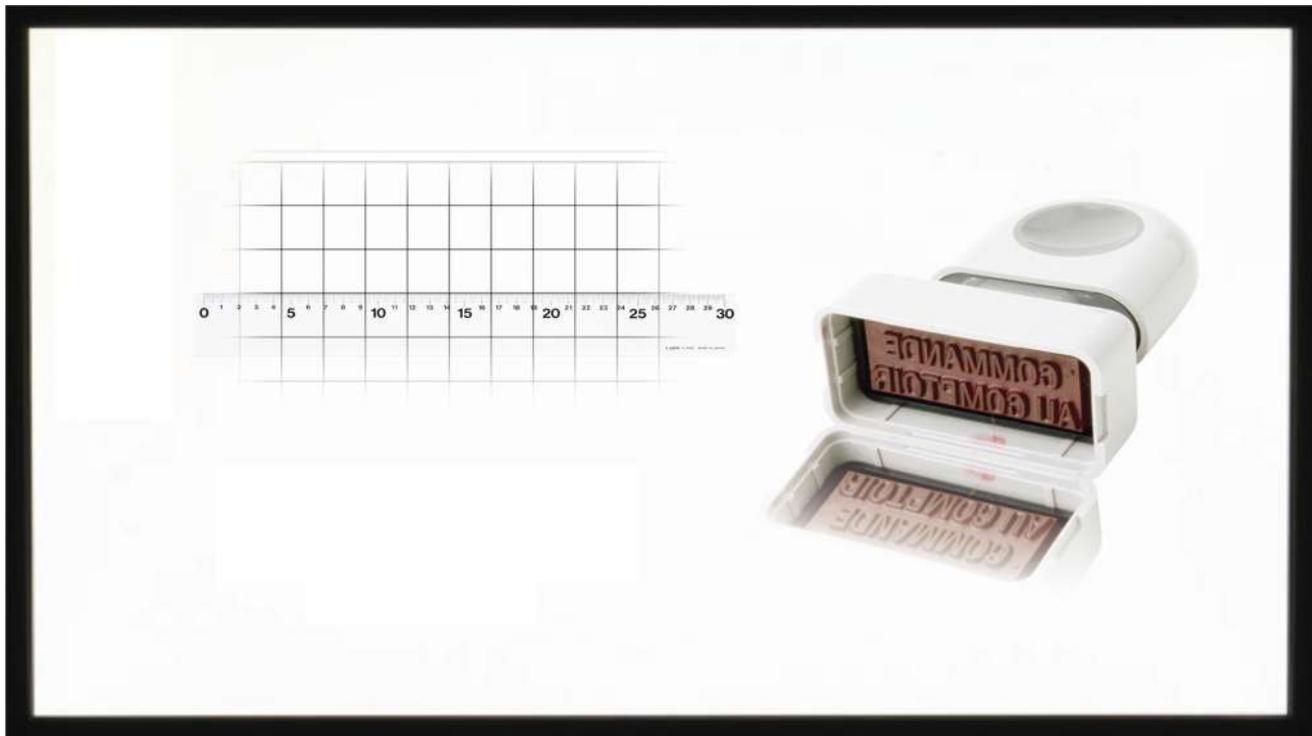
对《准则》和《条例》进行修订，是今年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点，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研判形势的基础上，为适应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准则》和《条例》的修订印发，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举。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只有从严要求自己，才能肩负起历史使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信心，战胜13亿人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

险和挑战。中央第二轮“巡视清单”显示，“管党治党不严”是被巡视单位的一大共性问题。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不严、责任担当缺失，已成为党的一大忧患，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要解决现阶段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依然要靠理想信念宗旨的引领，靠严明纪律作保障，“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二）原有准则和条例已经不能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需要。



2010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对于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该准则内容过繁，“8个禁止、52个不准”，让人难以记住；凝炼正面倡导不足，禁止性条款过多，没有体现自律的要求；禁止性条款纪法不分，既与党纪处分条例重复，又与刑法等法律规定重复；“廉洁”主题不突出，不能有效应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适用对象窄，仅针对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未涵盖全体党员。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虽然对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不少条款已不能完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需要。最突出问题是纪法不分，半数以上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上的高标准、严要求，无法体现党的先进性，在实践中管党治党不是以纪律为尺子，而是以法律为依据，导致了“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现象。同时，还存在对政治纪律规定不突出、不具体，对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必要而严肃的责任追究；主要违纪情形针对的是党员领导干部，没有覆盖全体党员等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不断深化，中央主动顺应形势发展、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全体党员为规范对象，对《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修改，针对现阶段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范，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创新经验转化为纪律和道德要求，真正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在全党树立起来，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

二、准确把握《准则》《条例》的主要内涵

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是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对树立党章权威、扎紧制度笼子，改进党的作风、严明党的纪律，不断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境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准则》是执政党的道德宣示和行动的高标准

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向来是从高不就低。古人说：“本根不摇，则枝叶茂盛”。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准则》开宗明义，提出全体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将落脚点放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展现党的先锋队本色，树立起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够得到的高标准。

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要靠自觉，靠长期的自我修养和党性锻炼。《准则》坚持正面倡导，变“不准”为“自觉”，把原有的“8个禁止”“52个不准”有关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党纪处分条例，只提出正面要求，不作禁止性规定，要求党员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遵守党员行为规范，还要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准则》既面向全体党员，又突出“关键少数”。廉洁是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准则》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全体党员，要求党员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同时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更高要求，二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

《准则》继承和发扬党的制度建设的好传统，

借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述，向全党提出“四个必须”和“八条规范”（即“四个坚持”“四个自觉”），集中展现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准则》仅281字，做到了要义明确、一目了然。

（二）《条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和党员的行为底线

新修订的《条例》分为总则、分则、附则3编11章133条（原条例3编15章178条），体现了时代性，内涵丰富，针对性强，有以下几个特点：

尊崇党章，细化纪律。党章是党内根本大法，是管党治党的总章程。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遵循党章，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党章，把党章的权威立起来。修订《条例》从全面梳理党章开始，把党章和其他主要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细化，明确规定违反党章就要依规给予相应党纪处分。将原来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为主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规范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6类，使《条例》的内容真正回归党的纪律，为广大党员开列了一份“负面清单”。

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党的全部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打头、管总的。不管违反哪方面的纪律，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破坏政治纪律。当前，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政治纪律认识模糊、思想麻木、意识淡漠。加强纪律建设，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远排在第一位。《条例》针对现阶段违纪问题的突出表现，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对反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增加拉帮结派、对抗组织等违纪条款，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党的集中统一。

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在全面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条件下，原《条例》最突出问题就是纪法不分，仅这一点就凸显了修规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修订《条例》坚持问题导向，做到纪法分开。凡是国家法律已有的内容，就不再重复规定，共去除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

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在总则中重申党组织和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分则中规定，凡是党员被依法逮捕的，都应中止其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党员权利，凡是党员干部违法犯罪，除过失犯罪外，一律要受到党纪处分，从而实现党纪与国法的衔接。

体现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条例》将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方面的要求，转化为纪律条文，体现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不是一阵风。针对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等违纪条款。突出群众纪律，新增了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等违纪条款，对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用纪律保障党的宗旨。

修订后的《条例》适应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了对依规治党规律认识的深化，实现了纪律建设的与时俱进。《条例》是管党治党的一把戒尺、党员的基本底线和遵循。全体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敬畏纪律，守住底线，防微杜渐，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全面贯彻《准则》《条例》的具体措施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制度最终靠人。《准则》和《条例》既是对党的各级组织的有力约束，也是全体党员的基本遵循。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是室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责任，必须一起抓、一体执行。

（一）抓好《准则》《条例》的学习宣传。把学习宣传贯彻《准则》和《条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把学习《准则》和《条例》与学习党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深悟透、融汇贯通，把握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我室具体情况，联系自己的职责，联系自身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解决最突出问题，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机关党委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纪律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把《准则》和《条例》纳入中心组学习和党员教育培训内容，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地进行宣传教育，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浓厚氛围。

（二）室务会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严明纪律是推进伟大事业的重要保证。党章第37条规定：“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党领导一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的领导本身就包含着管理和监督。执行《准则》和《条例》，决不能只是墙上挂挂、嘴上说说，必须一把尺子量到底、一寸不让。室务会一方面要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努力强化广大党员的党章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和组织意识，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部署，真正把纪律严起来、执行到位。另一方面要发挥表率作用，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敢于较真，同一切违反纪律的行为作斗争，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营造风清气正、干净干事的良好环境。

（三）依靠制度治室确保《准则》《条例》落实。不断总结经验、研究规律，通过建立健全和落实各种相关制度，用制度来管人、管钱、管事，用

制度来规范行为，确保《准则》《条例》贯彻落实。一是抓好建章立制，在对现有各类制度进行全面认真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善室内涉及人、财、物的规章制度、办事流程、岗位工作标准和人员行为准则，对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过时制度，要坚决废止；对缺少的制度，要抓紧制定；对不健全的制度，要修订完善。在全室树立道德“高线”，划清行为“底线”。二是抓好制度执行。对制度执行的实质是落实到位，真抓实干，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做选择，要防止一阵风、走过场。要求做到的，坚决执行；令行禁止的，坚决不做；灵活把握的，从实际出发。三是抓好监督检查。我室纪检机构和纪检人员必须发挥带头作用，坚守党章赋予的职责，时刻把纪律挺在前面。以《准则》《条例》为准绳，监督检查党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室内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在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上开动脑筋，多想办法，下真功夫，通过不断改进和落实各项制度，逐步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

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准则》和《条例》的深刻内涵，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的要求，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使廉洁自律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守住道德、纪律“底线”，以实际行动全面践行“三严三实”。

（本文选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承先在省委党史研究室“三严三实”专题学习报告会上所作的廉政党课报告。）



领导干部应该多学习点历史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摘编》有感

文/陈松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科研管理部选编的《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论述摘编》一书，摘选习近平同志2007年10月至2014年10月15日期间已公开的讲话、谈话等100多篇重要文献。展卷品读，豁然开朗。笔者不辞固陋，结合自身情况，与诸位同仁分享学习心得。

明白学习历史的三大功效

学习历史有助于提高领导干部认知。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历史现象背后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提供有益启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内改革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需要深入分析和解决的问题很多。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需要通过学习历史来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在对历史的深入理解中准确把握现实、正确创造未来。

学习历史有助于加强领导干部修养。习近平同志指出：“领导干部读点历史，有助于提高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修养。”一方面，通过学习这些历史，领导干部可以深刻认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强大生命力，深刻认识党领导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的光辉业绩，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始终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通过学习这些历史，领导干部可以坚定理想信念，时刻不忘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精神追求，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而不懈奋斗，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学习历史有助于拓宽领导干部思路。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记述了前人积累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记述了他们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与智慧，记述了他们经历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中披荆斩棘、不断开辟胜利道路，展示出了令人惊叹的勇气、智慧和力量，展示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干部学习这些历史尤其是党的历史，可以从中学习借鉴如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学习借鉴如何驾驭复杂局面，确定合适的工作方法和思路，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掌握学习历史的三大技巧

领导干部要系统读“中国历史”。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主张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手段并用。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中国历史上，为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留下了很多可取的思想 and 经验，诸如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才兼文武、德才兼备，敬贤敬能、礼贤下士，访求俊彦、唯贤是举，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勤于教养、百年树人……现如今，我们强调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树立重视基层的导向，注重选拔长期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优秀干部。这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历史经验的借鉴。作为新时期领导干部，当系统读中国历史，学会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领导干部须重点读“中共历史”。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共的历史，总得来说是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其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世所罕见。如1934年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胜利北上推动了全民族团结抗日；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党及时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并果断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汶川特大地震、玉树、芦山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党中央处变不惊，积极应对，成功夺取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重大胜利……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知难而进、百折不回的奋斗历程。作为新时期领导干部，当重点读中共历史，学会借鉴经典、以史励志。

领导干部应善于读“世界历史”。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学习世界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拓宽战略视野，锤炼战略思维，提升战略筹划能力。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结合领导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或者吸取应用，或者作为借鉴，或者引为警戒，从世界历史中准确研判世界发展大势，把握世界发展的大规律，树立世界的观念、战略的思维与开放的眼光。作为新时期领导干部，应善于读世界史，学会在全球大势中时刻敏锐把握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历史方位与使命任务，增强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遵循学习历史的三大要求

要学有所“循”。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部教科书，有其自身的学科规律，因此，学习历史，就要遵循其学科规律去学，按照历史主线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学、完整地学、准确地学。而不是零碎地学、枝叶地学、盲目地

学。做到这一点，学习过程中，除了完成脱产培训的课程外，重要的是在职自学。这就要得要领、得方法。比如在方法上，可以通过高校的网络远程教学、通过听取专家辅导讲座等方式，加深对历史的理解，提高学习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要学有所“得”。习近平同志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特点鲜明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无论在发展顺利之时，还是身处逆境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理想信念的力量，秉持崇高精神的力量，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今天，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依然是共产党人砥砺品行的不竭力量，永葆本色的精神钙片。因此，学习中共党史，从这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吸取营养，做到学有所“得”，这就要通过系统、完整、准确地学习，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努力在提高思想觉悟、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上有所获得。

要学有所“用”。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为人们正确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提供历史依据和历史启示，更好地为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服务。”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的目的是服务现实。我们要通过对历史深入学习思考，更加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更加主动顺应世界大势，更加自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加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这“五个更加”做好了，学有所“用”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读史使人明智，鉴往而知来。作为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都当多读点历史。从中汲取智慧营养，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经受住“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从中感悟党的力量和伟大，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作者单位：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工作

文/郭生春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认识到加强干部教育，提高党的干部队伍素质，对于保持和发扬共产党先进性的极端重要意义。今年是中央决定在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年，又是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习总书记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借此机会，我对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工作给大家作梳理，以期能对我们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有启示、借鉴作用。

一、抗战时期党开展干部教育工作的主客观原因

抗日战争期间，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发端于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该年6月1日，中共中

央将原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改建成立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次年1月，又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随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鲁艺”等一批干部教育学校。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开展的大规模的干部教育工作，不但非常及时，而且也富有深刻的历史含义。它是和党当时所承担的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历史重任以及党的干部队伍状况等有着密切关系的。

第一，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来看，党需要通过加强干部教育，才能承担起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历史重任。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与复兴的伟大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事关民族兴衰存亡的艰苦斗争中，肩负着发展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

结全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中流砥柱作用。要完成时代所赋予的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党就必须培养和建设一支浩浩荡荡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但当时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从30万减少到3万，党员从30万减少到4万。是不能适应抗日战争所导致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共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急待发展壮大；党通过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积极吸收大批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加入共产党，而使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余人，至1940年发展到80多万人（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发展到120多万人）而得以基本解决。二是广大党员干部的素质急需提高，就必须要通过开展干部教育工作来解决。

第二，加强干部教育，也是中共中央从当时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现实状况做出的必然决定。抗战初期，党的干部队伍在文化知识与政治理论素养的结构上，大致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这样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又经历过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考验，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二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同志在经历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后，已经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另外一些同志在工作中生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如王明；三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队伍的进步青年学生，他们虽然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和斗争热情，愿意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但他们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了解较少，不甚懂得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与特殊性；四是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的工农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经历了血与火斗争考验，但是因为不识字或识字不多，进步不快，难以解决复杂问题。因此，抗战初期中共党因大量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加入，从而使得党的干部队伍素质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要求极其不相适应，这就在客观上对

党加强干部教育工作，提出了要求。正如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各级党部必须根据具体环境与党员政治文化程度，进行有系统有计划地教育工作。”^①

第三，加强干部教育，也是党中央高瞻远瞩，从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长远需要出发，所做出的富有远见卓识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一个伟大转折。为了适应这一重大转变，就需要全党同志认真学习，虚心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教育。对此，毛泽东曾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党不但要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政治领袖、军事指挥家，还需要有自己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经济技术专家和教授，要拥有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又懂得专门科学技术或者文学艺术知识的优秀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就是在上述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二、抗战时期干部教育工作的的发展

干部教育，作为共产党党建工作的基本和核心。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党的干部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他们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丰富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修养，使之成为一支政治立场坚定，有知识、有能力的干部队伍。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初始阶段（1936年—1938年10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抗日民主运动高涨，面对这样新的政治形势，1935年12

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以后，开展干部教育工作以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便日益突显出来并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在1937年4月的一份《告全党同志书》中，中共中央强调指出：“新的形势更要求我党同志迅速的彻底的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为此，党的各级组织“更应特别注意党内老干部的重新教育与新干部的培养，加倍努力扩大与巩固自己的队伍，到处建立起共产党严肃的与坚固的堡垒。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②此后，中共中央除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文件外，还相继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鲁艺”等等17所干部教育学校，这些学校学生多者上万人，少的也有数百人。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这些学校的办学成绩时说：干部教育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已经教育出来以及正在接受教育的学生达3万人以上。这是我们党干部教育工作的伟大成绩，是过去18年未有过的现象。并且强调指出：今后我们应继续加强干部教育，多开办一些这样的学校。^③由此可见，初始阶段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在当时即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且也为后来的干部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大规模在职干部教育阶段（1938年10月—1940年中期）：1938年9月到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了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会议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更明确地提出“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伟大力量”，必须对全党干部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为了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开展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央首先把在职干部的教育提到了干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位置，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中共中

央干部教育部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计划》将接受教育的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主要是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他们的必修课是《联共党史》、马列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乙类为文化水平较高而入党时间较短的新干部，他们以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革命与中国问题为必修课；丙类为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他们同时学习文化课与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问题与中国革命等为必修课，其中文化课必须达到能看懂普通书报的水平。党对在职干部的教育目标主要有三条：一是自上而下一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三是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文化水平。在学习方式上，贯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精神，保证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通过一系列措施，在职干部教育很快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干部教育走向学校教育的正规化阶段（1940年中期—1942年初）：在在职干部教育蓬勃开展起来以后，从1940年中期起，党对干部的学校教育也由短期轮训转向正规化。具体的做法：一是延长学制，分为半年和1—3年等多种形式；二是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以对学员进行系统而全面的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

当时的学校教育，分为两类：一是直接为政治领导、军事斗争服务的党、军、政干部学校，二是各类培养科学、文化艺术以及其它专门人才的学校。在它们之中，党校作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在抗战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建立起了从中央党校、中央局党校到省、区党委党校以及各类党政干部训练班在内的涵盖面极广泛的党校教育网络。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要将所属各级干部轮流调入党校学习。若因环境关系不能办党校者，则须将干部调派到中央、中央局或区党委党校学习。

4、以“延安整风”为标志的思想教育运动阶段（1942年2月—1943年10月）^④：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整风运动，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干部教育运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延

“延安整风”的全部过程，实际上就是教育干部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过程，特别是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的过程。因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采取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的学习方法。在运动中，党员干部首先要刻苦学习党中央指定的22个马列主义基本文件；在领会了文件精神、掌握了思想武器的基础上，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己的历史、思想和工作，进行一次深刻而全面的反省和检查，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与革命自觉性。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一大批干部迅速地成长起来。

延安整风运动成为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党内干部教育理论。

三、抗战时期党开展干部教育工作的成功经验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不但在当时即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展干部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启鉴作用。

第一，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认真学习，是干部教育工作蓬勃发展的有力政治保证。中共中央在抗战前期的干部教育工作中，始终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环节，严格要求党内老干部和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努力学习，成为全党同志的学习模范。对于干部教育的每个环节，“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保证之。”^⑤为了表明中央对干部教育工作高度重视，毛泽东率先垂范。亲自出任“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同时还经常到中央党校、抗大、马列主义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为干部学员们授课。而且，“延安整风”运动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从抓120多个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开始，又以集中党的高级干部来总结历史经验，作出《历史问题决议》以将全党统一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宣告胜利结束的。由此可见，党的各级干

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们的言传身教，对于推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起到重要的作用。^⑥

第二，建立、完善干部教育的机构与制度，是干部教育工作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可靠组织保证。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防止干部教育工作流于形式，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有力的政策措施，使干部教育制度化、正规化。一是专门成立了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部长的中央干部教育部。二是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关于干部教育的学习、督促、检查考评制度。在这些规章制度中，比较重要的有：（1）两小时学习制度；（2）学习小组制度；（3）轮训班制度；（4）教员、学习指导员和学习顾问制度；（5）检查与督促制度；（6）定期测验和考试的办法。为了推动干部教育以及对学习优秀的干部进行奖励，中央决定从1940年起，每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干部教育与学习经验并进行奖励。这些规章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的学习热情，使得抗战前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得以扎扎实实地开展。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是干部教育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保证。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为了在干部教育中切实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宗旨，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一是在指导思想大力倡导“为用而学”的原则。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告诫全党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二是在干部教育形式上的理论联系实际。根据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所处的复杂环境，要求各级党组织，实行因地制宜的原则，灵活地选择学习的方式，以达到有实际效果的教育目的；三是教育内容上的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知识上严重地参差不齐状况，中央将干部教育的内容分为政治教育、业务教育、理论教育和文化教育四大板块，以便适合每一位同志；四是课程设置上的理论联系实际。干部教育的课程设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原则，分为初级、中级

和高级三类课程。

第四、对干部进行科学、系统的教育，而非断章取义地零碎宣传，是保证干部教育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刚开始时，由于缺乏计划性，在干部学习上一度显得比较零乱、片面而没有系统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各级党委在干部教育中切实注意到学习内容的丰富，并且具有系统性。比如，在课程的设置上，要求注重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现状、党的政策策略等多方面的有机结合。此外，党中央还规定：“为了提高学习的质量，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以求学习的深入。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为培养和提高党的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而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的干部教育运动，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党由失败向胜利转折的伟大时期，是中共党由弱小而走向强大的重要转折点。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从党员的人数、军队的数量，还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际控制的国土面积和在全国的影响，都比抗战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实现这个重大的转变，也与党开展干部教育，极大地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是分不开的。例如，“抗大”在八年抗战期间，一共培养了10余万名军

政干部。其中仅1938年底到1940年春，除了在总校办了8期外，还在各抗日根据地办了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年附设小学，为党培养和培养了大批具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军政素质的党政、军干部。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民族根据地还培养了大批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建设新中国提供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邓小平指出，抗日战争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蓬勃发展与成熟。而这种发展与成熟，又主要集中地表现在通过干部教育所达到的思想理论上的成熟。^①这就启示我们：只有通过开展干部教育，才能切实地解决好干部的基本素质问题；只有较好地解决了干部的基本素质问题，党的建设才能搞好，我们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才能够不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之际，重温抗战前期中共党的干部教育历史及其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55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03—204页。

③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3页。

④一般而言，广义上的“延安整风”起始于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迄于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结束。但是从干部教育的角度，即指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在全党干部中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另外，理论界和史学界对于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有许多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文只是从干部教育的角度略做简述，不再泛泛而论。

⑤《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28、302页。

⑥参见：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1921—1949）》之有关内容。

⑦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册，第346页。

中共内江党组织对抗战胜利的贡献

文/余崇威 吉腾久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中国共产党率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抗日武装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个辉煌战绩；而地处抗日大后方的四川各地中共党组织和中共党员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积极支援前方抗日。中共内江各县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积极开展各种救亡活动，动员青年从军，组织群众为前方将士募捐，鼓舞人民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7年11月，党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等人回四川建立党组织。次年1月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工委成立后，先后派党员到内江、简阳等县开展工作，并在隆昌、内江、资中建立了中共县级组织机构，威远随后也建立了中共中心支部、支部等组织。内江市现辖各地党员人数最多时有118人，但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在四川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内江市各地的中共党组织也先后多次遭到破坏，有的与上级失去联系，在1943年前后相继停止了党的组织活动。

一、抗战时期内江市各县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内江县：1938年6月和9月，省工委先后派共产党员吴汝翎（吴梅）和谢碧芳回内江工作，9月成立了中共内江县特支，谢任特支书记。1939年春，经上级批准成立了中共内江县委，至1943年

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为止，先后任县委书记的有闻化渔、艾尔达、谢长踪，王远仁，其间郑志远曾代理书记，刘藩曾负责过县委工作。县委成立后，先后建立了暑衣厂、复兴荣糖果号、龙门镇曾氏小学、元坝场、吴家铺等5个支部和省职校、沱江中学、妇女3个党小组，共有党员17名。内江县的党组织在1942年3月前隶属自贡（中心）特支、自贡中心市（县）委领导，其后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

威远县：在抗日战争时期，自贡、荣县的中共党组织曾先后在威远县境内建立过一个中心支部、5个支部。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中共自贡中心市委派黄世元（黄友凡）在威远县立初级中学发展8名学生入党，建立了威远城区支部，1940年4月支部消失。1938年底，中共荣县党组织派人在威远五里浩建立中共五里浩支部，1942年2月停止活动。1939年春，中共荣县章佳区委派人在威远梧桐乡建立中共梧桐支部，至1942年2月停止活动。1939年夏初，中共自贡中心市委先后派黄启明、张占鳌到威远静宁寺东北中学发展党员23名，于1940年3月建立中共静宁寺东北中学支部，1941年初党员转移后支部消失。1940年秋中共自贡党组织派傅鸿藻在威远县界牌建立中共界牌支部，当年冬扩大为中心支部，下辖一个农民支部，至1941年8月组织消失。

资中县：1938年下半年，中共党员董维藩等来资中女中任教，1939年1月，中共川康特派中共党员于中到资中组建党组织。并与董维藩等取得联系，并先后发展了李熏风、邓良弼等10多名党

员。3月，建立了资中特支，书记于中、董维藩，隶属中共川康特委领导，特支建立不久，在北城小学建立了北城小学支部。至1939年5月特支组织消失。

隆昌县：1938年5月，中共党员刘仕咸从庆符县（现高县）回到家乡隆昌，不久与中共泸县中心县委联络员取得联系，积极进行党员的培养和发展工作。7月建立了中共隆昌特支，刘任书记。9月刘仕咸到泸县23兵工厂工作，离开隆昌。1939年春，中共党员余照林从庆符回到家乡隆昌。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派联络员缪克刚与余取得联系，指定余担任特支书记，不久，余离开隆昌。6月泸县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巡视隆昌，重新确立了特支书记。到1940年春，特支的党员先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二、内江各县党组织为抗战胜利所作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党组织领导各县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竭尽全力宣传和动员人民支援前方抗日斗争。

（一）积极领导和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内江市现辖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卢沟桥事变后，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1938年春以后，随着各县中共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1、各县筹备组建抗日剧社和歌咏队。从1938年起，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内江各县先后成立了以抗日救亡、民主进步为宗旨的剧社和歌咏队。如内江“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内江孩子剧团”，资中“孩子剧团”，资中女中“抗日宣传队”、“资中业余剧社”，威远界牌支部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以及隆昌县歌咏团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内江县“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和“内江孩子剧团”。

内江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是吴汝翊在1938年8月筹办成立的。为配合全国救亡宣传运动，兴华救

亡歌咏话剧社上演了大批极具感染力的抗日救亡街头剧、活报剧、歌剧。1938年10月，中共内江县委重建，县委书记闻化渔亲自为剧社撰写了《一个工人》的话剧剧本，并亲自参加演出。中共内江县委组织委员谢碧芳除亲自参加演出外，还组织20余名青年参加的“晨呼队”，每天天刚亮便带领“晨呼队”沿内江县的主要街道“晨呼”，他们边走边唱抗日救亡歌曲，以影响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剧社还派人到驻扎在禹王宫和圣水寺的国民党军队士兵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给前方将士募捐寒衣，剧社组织了几个寒衣募捐队，配合宣传队、歌咏队深入街头巷尾、茶馆旅店进行募捐义演。

2、创办各类抗日救亡刊物、壁报。为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把抗战的国际国内形势，党的抗日主张和人民军队抗日的英勇事迹，直接传播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在各县中共党组织领导、支持和影响下，创办了一批抗日救亡刊物、壁报。当时影响较大的有资中北城小学的《小战士》周报。该报由中共党员李薰风主编，所载文章以抗日救亡宣传为前提，内容充实，深受资中全县及周边各县少年儿童和群众喜爱，发行量由几百份上升到近万份。

3、利用重大纪念日宣传抗日。1939年“三八”节时，中共党员谢碧芳、孙礼娴利用妇女会常务理事的合法身份，借“三八”节庆祝大会之机，向到会的300余名妇女儿童宣传，定要团结起来，争取自由平等，认真学习文化，积极支持抗日。会后还上街游行，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在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日当天，内江县榉木镇四川酒精厂全体员工素食一日，以资纪念。“三二九”是辛亥革命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内江县人民为纪念烈士喻培伦将军修建了大将军祠，每年3月29日，都要在此举行纪念活动。1939年的3月29日，沱江中学的党员教师带着学生来到大将军祠，瞻仰喻大将军像，中共内江县委委员廖友陶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事后，教师给学生布置了一个题为“记参观喻大将军祠”的作文，中共内江县委书记闻化渔在负责编辑

的《内江日报》副刊上还刊登了其中3篇文章，以扩大这次活动的影响。

4、邀请知名人士作报告。1939年6月，沱江中学的党员教师邀请多次深入前线报道战况的范长江给学生作抗战形势的报告；邀请著名作家老舍在沱江女中部作演讲，附近学校的老师也主动前来聆听。在整个八年抗战时期，应邀前来内江各县作演讲的知名人士还有黄炎培、冯玉祥、马寅初等人。

（二）领导和组织各种募捐，支持前方抗战。

1938年后，各县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党基层组织，各地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领导和组织开展抗日募捐活动，主要包括“寒衣捐”、“航空捐”、“一日一捐”、“劳军竞赛捐”、“节约献金”等活动。捐献的钱物一部分由各救亡团体直接送往前线，一部分则由抗日救亡团体组织购买棉布、棉花，缝制棉衣、棉裤、棉鞋等寄往前线，多数则由政府逐级上解，主要用于前方购买飞机、大炮和坦克，部分用作慰劳前方将士。

（三）积极领导工人、学生等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内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逐渐转为对内反共。在1939年至1943年间，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

在这期间，内江各地中共党组织领导和支持工人、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为团结教育工人，中共内江县委在城内桂湖街建德小学内办起了“民众夜校”，县委书记闻化渔和组织委员谢碧芳亲自任教。1939年8月15日，县委动员了57名工人成立了缝纫工人合作社，这年底香港工人反汪（精卫）罢工消息传到内江，缝纫工人合作社在中共党员胡玉林等人的倡议下，筹集了10元钱寄往重庆《新华日报》转交香港，县委书记闻化渔亲笔代工友起草了致香港反汪工友的信，有力的支持了香港反汪工友的罢工斗争。

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1942年内江中国炼糖股份公司（三元糖厂）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举行了连续三天的罢工斗争。1943年内江县立中学为反对县政府和校长欺压教师、摧残学生，举行了罢教、罢课斗争。1944年夏，内江航运工人不堪忍受水上警察的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奋起反抗，200余名船工冲进水上警察分局，捣毁其办公室，将警察局的蚊帐、箱子、文件等运到河对岸焚毁。这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

（四）贯彻党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

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中共中央作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和工作方针：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根据“十六字”方针，中共中央南方局要求地下党员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实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进行隐蔽斗争。据此，内江各县党组织先后转入地下，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秘密地开展党的工作。中共内江县委书记谢长踪以教师身份在内江县便民乡艾有三家教书，以此为掩护与党员保持联系，积极开展党的活动。1944年9月，在璧山工作的中共党员沈寄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回到隆昌乡师校任教，兼任《隆昌人报》编辑。他和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先回到该校的刘作先、蒋启予一起，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三勤”“三化”的要求，积极开展活动。他们在学生中成立了“教与学社”，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并先后办起了《海燕社》和《原野社》壁报，宣传进步思想，抨击黑暗专制，抵制三青团的反动宣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隆昌乡师校青年工作“据点”，在没有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情况下，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

内江市现辖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在抗战的大后方，为广泛发动群众、团结抗日，鼓舞群众坚定信念，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内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战前期乐山地区 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

文/刘宗灵

抗日战争是中共组织力量得到极大发展，且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出现显著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抗战初期的两年多时间里，国统区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组织扩充，党员倍增，但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和自身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随后也先后进入巩固、整顿与自我调整阶段。本文选取四川省乐山地区地下党组织为个案^①，以此尝试呈现抗战前期西南国统区中心区域基层地下党组织发展历史图像的某个片段。

一、早期乐山地下党组织的发展与挫折

乐山地区近代以来经济发展较快，各类大小工厂较多，如盐场、丝绸厂、纺织厂、造纸厂、印染厂、煤矿等等，属于下川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工人数量庞大。因此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就有中共党组织在乐山地区活动。

1927年4月，经中共成都特别支部批准，乐山境内建立起了第一个中共支部——青神支部，帅昌时任书记。虽然很快大革命失败，但乐山境内的革命活动却在此后随之展开。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于1927年8月成立后，高度重视乐山境内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五通桥的盐业工人队伍被视为应首先组织动员的对象。四川地区最早的工运领袖之一钟善辅，以及苟永芳、余宏文等工运干部，都先后受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所托到五通桥地区发动工人，筹备建立工会及基层党组织。他们先后组织成立了由临时省委直接领导的中共五通桥特支、牛华后山党支部、中共牛华溪工委，以及五通桥盐业工会、犍乐盐场工联会、牛华溪盐场工会等

工运组织。^②中共四川省委曾计划在此地进行工人武装暴动，后由于叛徒告密而失败。1929年10月四川省委在工作报告中曾提到当地的工运活动，“上（川）南应以嘉定为重要，有织绸等工人数千。距嘉定60里之五通桥是次于自流井的一个产盐区域，有盐工甚多。五通桥很早是有组织的，后来在川西特委时代不知如何瓦解了，省委成立后即派人到嘉定工作，并清理五通桥组织，最近已清出过去的工人同志1人，现在五通桥暂时由嘉定党部负责发展。”^③乐山地区工会组织在1933年前后曾发展到一个小高潮阶段，总计青神、乐山、井研、峨眉、夹江等县的盐工、丝工、碗工、炭工、纸工等几个方面的工会共有11个，总人数约383人。^④

除了工运，嘉定、青神、峨眉、犍为等地的农民运动与武装暴动也曾一度有所发展，当地的农民革命领袖许本达、毛慈影、段兆麟、陈俊卿、段玉章等均在此区域有过相当积极的活动，他们发动农民，组织农协，领导抗捐抗粮反霸斗争，尝试建立革命政权，在屡仆屡起中艰难发展。1933年3月，当时嘉定（乐山）及其附近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近60人。1933年5月，在省委巡视员邹风平的主持下，乐山正式成立了直属省委的中共嘉定中心县委，领导嘉定、犍为、青神、眉山、井研、峨眉、夹江等地的党组织，这一举措起到了整合组织力量，推动革命发展的作用。^⑤在中心县委成立后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农运已有一定基础，“乐山（牛华溪）后山区农民组织600余人，眉山100余人，青神400余人，井研数十，夹江200余，峨眉5、60人。在岷雅军阀混战和邛大抗捐运动发动时，青神、眉州抗捐情绪一般高涨，峨眉曾提缴收

款团防枪支数十支”。^⑥中心县委推动农运不断向前发展。1934年底，在当时的乐山境域曾爆发过著名的青神西山农民武装起义，旋即为当地国民党政府派兵剿灭，许本达、段兆麟、毛慈影等起义领导人壮烈牺牲。

由于外部政治形势日益险恶，以及此阶段党在革命方针上不断的“左”倾错误，至1936年前后，从省委到基层组织的几乎整个四川地下党系统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乐山地区也不例外，革命运动跌入最低谷，一直到抗战前后，才又迎来新的转机。^⑦

二、抗战前期乐山地下党的重建与发展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组织恢复与发展也迎来一个新高潮。而此时的乐山，党组织恢复发展的趋势与全国一致，开始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姿态。

随着在土地革命阶段出狱的和离散的党员干部先后找到组织接上关系，乐山地区重新建党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侯方岳被派往乐山担负起整顿、重建地方党组织的重任。1938年8月，直属四川省工委领导的嘉属工委正式成立，侯方岳担任书记，李嘉仲、贺国干任委员。随着该地组织建设工作的开展，眉山、井研、峨眉、五通桥、武大等处的工作日益开展，县委、特支、支部等相继成立，同年底，嘉属工委正式改建为中共乐山中心县委。

由于在残酷的十年国内革命战争中，党的力量损失相当严重。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救亡的紧迫形势使得中央决策层深感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国统区和沦陷区——远远落后于其政治影响与现实需要，于是，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扩大党的组织、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

同月底，领导南方各省区党组织的中共中央驻武汉长江局也发出“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

义”的指示，要求南方各省把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和大力发展党员作为当前迫切而严重的任务。4月初，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川省党务工作。在会上，长江局就迅速扩大党员规模问题对四川党方面进行了批评，并作了更具体的指示：“在目前顺利条件下，川党三四个月时间仅发展340余人，已7000万人的四川，此极小数量的党员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作用的。……因此，川党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更进一步“规定川党要有10倍的发展，一定要负责这个任务”。邹风平返川后，召集省工委成员传达了长江局的指示，并制定了从6月1日起到8月底止完成10倍发展任务的计划。^⑧这一时期四川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

乐山地方的党建活动，即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展开的。不过因为各地区的基层具体情形存在难以避免的差异，其党组织发展状况也并非以统一步伐展开，地域差异相当明显。^⑨乐山地区并非川党整理与重建的首选区域，由于地方上的信息传递不畅、形势发展滞后、上级重视程度差异等各方面的原因，直到1938年下半年才正式恢复建立党组织。虽然恢复较晚，但乐山党组织在建立以后发展也相当迅速。曾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梁华（梁国龄）在报告中即曾提到“到大量开展期的最后期间，全中心县党员已到四百二十人左右（包括转来的与不记转去的）”，因此他认为“虽然主观上存在着许多缺点，其成绩却不算坏”。^⑩

譬如，仅乐山县一地，从1938年6月开始恢复组织到9月成立特支，再到同年底正式成立县委，党员和基层党支部从无到有，分别发展到50多人和8个；而到1939年5月前后，全县党员数达到130多名，基层党支部达13个之多，而且以城区范围内的工厂支部居多数。^⑪

整个乐山中心县辖区的党组织初期发展工作，进行得可算相当顺利。积极动员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独立自主的组织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发展多方面的救亡运动”，或广泛加入群众救亡组织以改造或领导之，这些都是中共在抗战初期的既

定工作路线。^②因此，乐山党组织的重建与发展，也与抗日救亡热潮之间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刺激关系。一方面，乐山党组织的恢复重建极大地激发了乐山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与群众运动，歌咏队、工会、抗敌后援会、抗敌墙报、抗敌宣传队、嘉乐书店等党领导下的外围群众救亡组织相继成立；另一方面，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兴起与高涨，也为党组织影响及组织实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与群众基础。从梁华的报告中，可以略窥一二：“……嘉定中心县委的主观力量实不弱。而抗战后至一九三九年五月该区域中的客观环境实也很好。如嘉定、眉山、峨眉、五通桥、夹江等地，一般的青年学生、工人、小学教员、店员等救亡情绪非常高涨，当时地方政府及国民党党部亦未给做救亡工作者有限制，甚至有峨眉县国民党书记长公开向我们同志说：‘救亡宣传工作希望共产党同志共同努力，共产党的同志做救亡工作也很有经验。’在五通桥的环境那可说更好，我们的贺国干、梁崇明两同志，在地方上自然是有地位，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的地位可说更高了，都知他们是共产党员，地方上无论什么人都尊敬他们，无论什么事都遵从他们的意见。”^③

三、乐山地下党恢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种问题

乐山地区与其他中共地方组织一样，在抗战初期蓬蓬勃勃的发展浪潮中，很快就暴露出了不少影响组织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问题。特别是抗战初期，成倍的党员数与党组织扩增，半公开的组织活动，未经历革命斗争洗礼的大批新党员不断加入……，这种种因素，都是导致乐山地方党组织在新局势下问题迅速暴露，以致组织大幅萎缩的重要原因。

（一）新党员素质良莠不齐

拉夫式的发展及新成员的良莠不齐，是与抗战初中共组织在各地方大幅扩张所伴生的最重要后果。虽然如梁华所言，在乐山“各地发展党当然是用秘密方式个别发展，亦是先建立各地领导机

关”，但因为抗战初期的热烈救亡气氛和国共合作暂处于蜜月期，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均转入地上公开活动，大多都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在这一时期中，各地党组织因为外部环境较好而普遍忽略了秘密工作原则，“发展党员几成公开形式，有一些地方的组织实是暴露无余，使后来环境变坏时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受到很大影响。”而且，在吸收党员的标准把握上各地也存在很大的问题，甚至出现了不少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拉夫似的发展”。其中比较典型的即是乐山中心县委下属的一个重要活动地点——五通桥通材中学，其追求扩张党员规模的程度可称狂热。该校总共“只二百余学生”，当地特支就在其中“发展了党员八十余人，已占全数三分之一强”，关键问题是“这些初中学生年龄小，社会经验差，文化水准也不高，阶级认识更是模糊”，一俟校长、教员离校，“一些学生同志便以为他们将不是党员了”，可见大多谈不上是合格的党员。^④

此外，在发展党员、拓展革命力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少计划性”的问题，“仅仅是在我们有组织的部门内竭泽而渔，为了追求数目字把最落后的人也拉进了党，不去开展新的堡垒。还有许多重要地方和重要部门，……我们在好环境时期却没有以先入为主去奠下党的基础，而在时局转坏后顽固分子即注意这些区域及部门，采用了防止我们，打击和诱惑积极的革命分子”。^⑤

（二）保密工作松懈

因外在形势与内在认识等原因，在抗战初期党员的大发展时期，乐山地下党保密工作做得很差。许多新党员纪律观念淡薄，工作非常招摇，“因为一些党员与干部的幼稚，领导机关的麻木，如一些同志很怕别人说他不是共产党员，几（总）想在身旁挂上一个共产党员的招牌。有同志手提的书包上戴上红五星和镰（镰）刀斧头；眉山县一个小学校我们有三个教员同志，他们在校里将教室及寝室都改名，代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东西、晋西北等地名，窗心纸写的是我们党领袖们的话剧，

讲的国语是《新华（日）报》上的文章；还有五通桥通才中学学生出了三十多种壁报，就在学校开小组会议。”^⑥即使在整顿时期，都有很多地方仍然舍不得轰轰烈烈抛头露面的救亡作风，难以接受和养成新的秘密的工作方式，“眉山的同志顽固的保存救亡作风，痛快主义，而终使组织垮台”；迁到乐山的江苏省立蚕专学校“同志不惯做点滴的工作，喜欢救亡作风，而领导的同志对掌握干部上未注意，以致奸细混入，结果暴露而遭逮捕。”^⑦

（三）党的干部缺乏

在党组织恢复与党员大发展的情况下，党的干部匮乏问题在各地都凸显出来，乐山地区也相当严重。乐山中心县委下辖县份众多，地域宽广，据报告“中心县总共有区级以上干部三十一人，但整个说来实不敷分配。”党员干部人数缺乏直接影响到各项工作开展，如众多女工就难以组织起来：“嘉定及五通桥两地工厂不少，女工多，目前我们的女党员也不少，男同志去领导因环境关系实在不宜”，而当地又最缺乏妇女干部，“这样对女党员的教育和发展很成问题”。此外，本地干部也较为缺乏，中心县当时现有干部大多为外籍人，“本地地区的干部实少，尤以五通桥、眉山两地干部实成严重问题”。中心县虽然做出巨大努力力图培养本地干部，可是成绩却不彰。主要原因是“发展时期工作作得坏，时局日渐转坏，顽固分子竭力向我们进攻，我们为了保存干部东疏散西疏散，……于是培养干部也受影响。现有干部又无法适合要求的使用，并以地区组织散漫，需要的领导者条件较苛，如目前五通桥、眉山县需要干部甚急。”因此报告者提出要用很大的力量努力培养本地干部才行，“否则时局日紧，外地干部不能立脚。”^⑧

四、乐山地下党组织的整顿与巩固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中央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前后掀起了反共逆流，先后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

办法》等多个针对性文件，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在此之后则大力加强了对国统区中共党组织的控制与打压。^⑨而各地党组织在跨越式大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为因应这种内外新局面，中共方面也及时调整政策加强了应对。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下发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这一指示。该《决定》指出各地征收党员的过程中存在着追求数目字、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不经审查等错误，这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组织的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因而在组织路线问题上明确规定：“估计到党的组织的现状与日前环境，党的发展一般地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定时期的中心任务。”^⑩

约两年后的1941年5月，党中央在面向全党发布的《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两个文件中，再次强调了“十六字方针”，要求“把所有暴露了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找职业，或是到抗日根据地，代之以新的未暴露的干部；要求坚决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各级领导机关，切实把握短小精干的原则；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中，不建立支部，党员独立活动；要求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尽可能地放在利用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方面，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紧接着，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对上述中央指示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再结合国统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制定了有关地下党在国统区行为准则的重要指示，并随之提出“三勤三化”的具体要求。

在上述历史大背景下，各地陆续开展巩固整顿党组织的行动，组织全面转向地下与紧缩。在南方局和川康特委等上级党委机关的指导下，乐山地下党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整改巩固措施，转入了巩固阶段。其应对措施主要有：

（一）开展组织整顿

1939年以后，五通桥盐务局大批更换通材中学教职员工，强化国民党势力，“他们同党组织争夺

通材中学领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在党员中发生了横的关系，暴露了党的机密”。针对这种混乱现象，中心县委曾派专人进行整顿，组织部长梁华及妇委杨维哲等“曾亲到五通桥区坐镇四、五个月整理该地工作，现在该校学生同志不管转出了或仍在校数目总不到原有半数了”。^①主要方法除了洗刷不合格党员外，还撤销了学校的独立特支，“把合格党员分班分级组成若干平行小组，实行单线联系。”经整顿之后，党员数量大幅缩减，但也更加精干，“男生部党员15名，女生部有党员5名，交给五通桥区单线联系”。^②此外，眉山县委因为拉进了许多国民党员，党内秘密悉数为人知晓，也清除了不少人。此外，嘉定、犍为、夹江、井研、眉山等地都进行了组织整顿，清除了一些对党认识不明，三心二意者或投机取巧分子，同时“移转红色干部，切实整理支部组织，重质不重量”，并进一步“停止一般的发展党员，加紧群众工作”。^③如1940年到乐山工作并任中心县委委员的刘作先回忆，当时主要是根据骨干党员暴露程度进行疏散转移，“如有的已‘红’到敌人黑名单上，就要立即撤退。撤退的办法，有的由上级批准送陕北学习，有的即在中心县委范围内调动。”如果仅是被敌人怀疑而未上黑名单者，即暂时停止活动，静观其变以定去留；完全未暴露的则继续在本单位发挥作用，秘密在群众中开展工作，以培养新的革命力量。^④

（二）开展党内教育

针对不少党员干部基本党务知识匮乏，理论水平低下，工作能力欠缺等问题，乐山地区重点组织开展了党内教育。中心县委本身及县区级干部均按照川康特委规定按期进行自我学习；针对支书、支干、小组长等基层党干曾有数次短期训练班，每期共计时间在十五至二十个钟点。讲授的问题主要有：统一战线、支部工作、秘密技术或党的建设。学生支则增讲青年工作；妇女则增讲妇女工作；工人则增讲职工运动。至于一般普通党员，也曾组织过多次的短期训练班，此外，日常还规定其读书汇报，根据支部中党员的文化水平定出学习计划。对于

新党员的教育，除介绍人尽可能负一部教育工作外，支书、支干或小组长或指定支内的同志进行新党员教育。对不识字的同志亦规定支内指定识字的同志负责教；如全支党员均不认字即指派别支党员去教。在这样的党内教育下，大多数支部党员的理论水准确实提高了不少，干部匮乏的问题也稍微缓解了。^⑤

（三）强化秘密工作

如前所述，抗战初期地下党的秘密工作理念尚普遍匮乏，“嘉定中心县所属各地，在开展党时期实把组织和干部暴露无余”。因此，在巩固时期这是地下党工作转变的一个重点。当时的中心县委机关采用住家形式，屋中不存放红色书籍，订的报纸也不送到机关。限制开会时间，“无论何级会议在房里不能过二小时，外面茶馆旷野不能过一小时半”，并且开会时不拿文件，不作记录，准备万一被人发现盘问时的口供。除中心县委本身这样作以外，对以下各级组织及党员的规定亦如此。如要求“每个党员随时随地不能带有文件及有妨害的日记及读书笔记，房内红色书籍不能随便摆放起，《新华报》、《群众》、《解放》等不能随便乱扯乱放，组织上的秘密文件不能借与任何人看及遗失，不准发生横的组织关系，常常举行秘密技术检查，若有不遵守不实行秘密技术，以党的纪律制裁”。^⑥这些措施确实在某些地方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夹江县某校有一个教师党员，“在学校加紧努力做好学生，取得学校当局及教师的好评，他的活动毫不引起学校注意，在四个月内，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吸收了三个优秀学生入党。”而之前的通材中学，在整顿组织并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后，支部质量与领导能力反而有所提高，不仅三青团的发展在校内受到抵制，“并且支部因功课努力，品行良好，博得校长器重，甚至校长托付这位同志去办平民学校，推行社会教育，更使我们支部同志有接近农民的机会。”其他如地下党支部领导的嘉裕电灯公司内的加薪运动与航委会保险伞厂的两次罢工，都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同时也保护了自身组织。^⑦

五、乐山地下党发展整顿历程中的启示

短短数年内，乐山地下党经历了抗战初期组织发展的突飞猛进与抗战相持阶段的自我巩固整顿，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昭示的种种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

1、善借“天时”。在抗战初期群众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局面下，乐山党组织没有错过机会，而是充分利用民众的抗日救亡情绪，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使得党的发展壮大与救亡运动的开展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2、善借“外势”。充分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力量，动员各种可以动员的资源，在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各种地方势力之间游刃有余，善用统战策略，对敌人进行分化。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不断扩大自身力量。如贺国干出身五通桥大盐商家庭，抗战后返回成都接上组织关系后，即被派回原籍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取得五通桥盐业工会主席与通材中学董事会负责人的职位，对党组织于抗战初即在乐山核心区掌握活动阵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善借“内力”。对当地既存的革命力量加以充分利用。对于大革命时代因各种原因失去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在进行审查之后，加以充分地信任和使用，利用他们原有的社会网络与个人关系重建党组织在当地的据点，这对当地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乐山地下党在发展过程中累积的种种问题，在政治局势一旦趋坏后，即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导致许多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工作陷于停顿，活动趋于消沉。这自然也与地下党本身工作的缺点与失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在随之进行的巩固整顿工作中，一些不合格党员被劝退，一批投机分子被清洗，党组织的“浮夸”与暴露问题基本被解决，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纯洁，还有更多数量的党员接受了一次合格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与锤炼。毫无疑问，当初革命先辈的这些做法和经验，也为当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 ① 本文中所谓“乐山地区”，意指抗战时乐山中心县委（嘉属工委）辖区，包含当时的乐山、眉山两个行政督察区（彭山县除外），与今天的“乐山”概念不同。
- ② 《中共乐山市党史大事年表》，收于中共乐山市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乐山市党史资料选编（1927—1949）》，内部发行，1987年，第113—115页。
- ③ 《四川省委两月工作总报告》（1929年10月9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4—12）》，甲4，内部发行，1985年2月，第218页。
- ④ 《嘉定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政治组织决议及白色恐怖情况》（1933年12月5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2—1934）》，甲8，1986年8月，第240页。
- ⑤ 中共乐山市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乐山历史（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 ⑥ 《四川省委昆致中央的报告——关于四川经济政治状况、党的组织和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1933年11月11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32—1933）》，甲6，内部发行，1985年10月，第521页。
- ⑦ ⑧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第232—233页。
- ⑨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2—285页。
- ⑩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梁国龄关于嘉定中心县委党的

组织情形及工作情形的报告——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九月》，《四川革命历史汇集（1940—1941）》，甲14，内部发行，1989年8月，第182页；第181页；第184—185页；第185—186页；第210页；第208页；第183页；第206页；第209页。

⑩ 中共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委组织部等编著：《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组织史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23页。

⑪ 《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1936—193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献选编》（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70页。

⑫ ⑬ ⑭ 《廖寒非关于嘉定中心县政治环境与党的巩固工作的报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七月》，《四川革命历史汇集（1940—1941）》，甲14，内部发行，1989年8月，第405—408页；第404页；第406—407页。

⑮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20—22页。

⑯ 《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56页。

⑰ 《中共通材中学特支始末》，收于《中共乐山市党史资料选编（1927—1949）》，第203页。

⑱ 《我在乐山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片段回忆》，收于《中共乐山市党史资料选编（1927—1949）》，第466页。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转战川滇黔

文/颜林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其举世无双的英雄壮举彪炳青史，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开展的游击战争，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为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而采取的一项战略决策，是红军长征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央红军在二渡赤水之前，在川南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这支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保证了中央红军顺利长征北上，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6年，张爱萍将军为纵队斗争史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活动地五龙山。颜林/摄

播下革命火种，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会议后，率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进发，拟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调集数十万武装堵在川滇黔边区，又令刘湘集中川军跟踪追击，阻止红军渡江。故党中央改变计划，转向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其时，叙永特区游击队派张友德与红军取得联系。2月4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黄坭嘴附近的田中五龙山四化榜，接见了游击队负责人，并派红军干部何宗舟等留游击队工作，扩充了叙永特区游击队。

2月9日，中央红军于扎西地区集结。党中央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实现战略转移摆脱敌军“围剿”。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新的战略部署，决定红军回

师东进，二渡赤水；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精简机关，充实连队，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同时，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根据扎西会议关于创建川滇黔边区新的根据地的决定，中央和中革军委抽调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中共川南特委负责领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乌江以北一个区域的地方工作，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2月10日，军委在扎西总部驻地，召

开留下组建游击纵队的100多名干部的会议。会上，根据中央决定，宣布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领导人的任命。由徐策、余泽鸿、戴元怀、夏才曦（夏采曦）等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徐策任书记。川南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2月12日，在石坎子河坝头，特委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中央关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2月18日，纵队人员与叙永特区游击队在叙永县树坪庙门前汇合后，共600多人，经黄坭嘴到达田中五龙山。特委在五龙山寺庙前召开纵队成立大会，特委书记徐策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讲明了纵队的性质和任务。特委和纵队的主要任务：一是在敌后牵制和打击敌军，配合红军战略转移；二是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三是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转战川南，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为牵制和打击敌军，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随即以各种番号在川南开展军事行动，并在叙永县木厂梁子阻击川军首战告捷后，继续向南六县进发，打开了一些重镇，使泸州的川军惶惑不安，误认为红军主力仍要寻机北渡长江。因此刘湘令郭勋祺率三个旅和保安团固守川南要隘，急令进至黔边温水的潘佐旅“星夜兼程回守川滇黔边的门户——叙永城”，又令第一路指挥范子英“兼程回古宋县金鹅池向叙永重镇两河口截击”。又电令独立第一旅第二旅移驻叙永，急令第二路达凤岗旅从黔北赤水“兼程赴叙永扼守”。滇军获悉红军已到叙永黄坭咀、两河口镇等地，“深恐乘隙窜滇”，急令到达叙永县分水岭之龚顺璧旅回守滇境。这样纵队就牵制了一部分围追截击中央红军的川滇黔敌军主力，配合红军顺利回师黔北，取得了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胜利。在叙永境内，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先后进行了首战木厂梁子、攻占朱家山寨、巧取叙蓬溪、袭击敌军车等战斗。3月初，纵队第五大队在落堡与敌军遭遇，激战2个多小时，毙敌数十名。战斗中，川南特委组织部长戴

元怀、大队长梁亚伯和通讯班的战士壮烈牺牲。不久，刘复初领导的南六游击队在兴文县建武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会合。纵队将其隶属纵队指挥，改称川南游击支队。5月，纵队转战到云南威信凤阳村邓家坪时，纵队司令员王逸涛叛变，两河区委及所属游击分队遭到严重破坏。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牵制敌军的方案，首先在川南地区实行，引敌进攻游击纵队。特别是有计划地逐步摧毁敌人基层政权，打开川南重要城镇，这使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在川南，电令刘湘加紧“围剿”。敌集结十多万兵力“围剿”游击纵队，从而牵制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红军主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之后，蒋介石忙调尾追中央红军的兵力，布置在川滇黔三省“围剿”游击纵队。就在纵队面临着三省敌军“会剿”的时刻，同年5月中旬，红军黔北游击队前来叙永县分水朱家山，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师合队。会师后，川南特委当即召开特委会议，会议决定：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纵队继续转战川滇黔边区，将川南、滇东北、黔西北二十多个县逐步开辟成红军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

浴血奋战，粉碎敌军“三省会剿”

红军游击纵队深入川南以来，转战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打乱了敌军部署，使敌军更加惊恐，于是更加紧川滇黔三省“会剿”。威信县长官司（今旧城镇）、红山口是川滇边要塞，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途经红山口时，遭敌埋伏，伤亡100多人，其中干部数十人，主要领导徐策等牺牲。后特委改组，余泽鸿任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同年6月中旬特委在威信县簸箕坝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粉碎敌军“围剿”的行动方略。纵队经过暂时休整，从云南滇东北取道镇雄，进占赫章城，又转入川南门户筠连境内，突袭下乐瓦，轻取巡密司，打开敌人认为固若金汤的筠连城，相继巧占叙蓬溪镇，闪击兰田坝，威胁泸州，迂回占据大洲驿，

佯攻纳溪城，转向南六县进军，袭击长宁附安场、江安红桥镇、珙县洛亥，再转赤水县一碗水场及黔西九仓坝等地，击败敌军追击。这些军事行动，拖着敌军团团转，到处扑空，完成了牵制敌军的任务。

游击纵队在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纵队由1000多人的武装减少成200多人了。为了改变危险的处境，1935年11月末，在长宁梅洞场贾家湾召开特委会议。会议认为，保存实力，战胜敌军“围剿”，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会后分成两队：一队由刘干成、余泽鸿、刘复初等负责；二队由龙厚生、黄富山、曾广胜等负责。分队行动后，二队行军到炭厂暴露目标，被敌击散。长宁县敌军疯狂围攻一队，余泽鸿不幸牺牲，刘干成、刘复初等组织深夜突围，天明到了踏水桥上隐蔽，次日下午又被敌围追，天黑时才将敌甩掉。次日部队到连天山时，只剩下17人。后来，通讯员徐茂良带了30多人武装前来归队，以后沿途又发动工农参军和收容归队的同志，很快发展到400多人，编成两个大队，恢复了纵队建制，仍在红军老游击区活动。

牵制敌军，配合红二、六军团长征

1936年1月纵队突破敌军“围剿”后，得知红二、六军团3月来到贵州，希望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留在敌后，继续牵制敌军，配合红二、六军团长征。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认为，纵队必须首先牵制川军，因此在兴文县落柏林、炭厂等地战斗，使川南敌军不敢全力向贵州围追红二、六军团。同年6月纵队来到贵州毕节地区，阮俊臣带来黔西北游击队200多人合队。之后，纵队又击败黔军柳际民旅和滇军补充团的进攻，声势浩大，反动当局极为恐慌，各县纷纷飞电告急，要求急速增援，“围剿”红军。同年秋特委召开会议，民主选举刘复初任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在特委领导下，纵队在川南大庙伏击珙县县长刘治国亲率“清剿”的县警备大队、卫

队、区民团及四川省第六保安团第十中队400多人。经过激战，打得敌人丢枪溃逃，共缴枪械90余支、子弹千余发，敌军死伤数十人，俘敌县警备队长等百余人。10月下旬，在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下，由刘少成带领川军教导师驻珙县地洞场的四团一营敌一个连士兵，武装起义前来当红军，壮大了纵队的声势。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面对纵队不断扩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川滇黔敌军加紧第二次三省“围剿”。由于中央选派的纵队骨干相继牺牲，敌我力量悬殊很大，领导层中出了叛徒，以及在战略、策略和战斗指挥上出现失误，加之纵队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游击纵队在坚持了两年之后，于1937年1月最终失败，以其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壮歌结束了它的光辉历史。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及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特委领导下，前仆后继，历经艰险，坚持游击战争，基本上完成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交给的光荣任务。特委和纵队在边区牵制和打击敌人，对于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和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滇黔边区，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三省数万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围追堵截下，特委和纵队领导人中的绝大多数先后壮烈牺牲，他们所组建的川南游击支队、云南游击支队、贵州游击支队，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困难条件下，响应党中央号召，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团结爱国力量和开明士绅，秘密发动群众，扩大力量，采取灵活巧妙的斗争方式，不断抗击反动军队和地方团防的“清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反动派十分震惊，在掀起反共高潮之时，对游击队不断发动“会剿”和“清剿”，疯狂屠杀游击队员及其亲属。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贵州游击支队仍坚持战斗到1941年，川南游击支队坚持战斗到1945年，云南游击支队坚持战斗到1947年。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和英雄气概，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将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作者单位：泸州市叙永县人民政协）

德阳早期工业区建设的曲折历程及其分工协作经验

文/杨倩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阳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开始工业区建设工作。而受当时国家整体发展环境的影响，德阳早期的工业区建设也经历了从建立到撤销的“两上两下”曲折历史。在此期间，为有效整合资源，德阳工业区和德阳县展开了各方面的分工协作，并不断调整变化。这一分工协作机制对德阳建设重工业基地产生了重要作用，其宝贵经验为日后三线建设和新兴工业城市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日后德阳的建市奠定了基础。

一、德阳工业区发展历史中的“两上两下”

受国家宏观经济建设政策和战略调整影响。德阳工业区的建立与撤销经历了“两上两下”，第一次是1956年9月成立，1957年9月撤销；第二次是1958年8月建立，1960年6月撤销。

（一）工业区的第一次建立与撤销

在德阳建立工业区，既是中央战略部署的结果，也有德阳得天独厚的自身优势因素影响。1956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兴工业城市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成都及周边地区被确定为当时全国“10个重点区域规划”之一，同时也被确定为全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布点建设的重点之一。而当时的德阳具有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优越条件：一是资源优势，德阳位于成都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可以为现代大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农副产品保障；二是区位优势，德阳县位于成都以北50公里，

靠近城市，可以有效借助成都大城市的人才、科技、工业、信息等优势资源；三是交通优势，当时的川陕公路和宝成铁路都在德阳交汇，让德阳的交通优势更加凸显；四是地质优势，德阳地下水位低，地质板块结构坚硬，有利于大工业建设。

正因为如此，1956年6月14日，四川省委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兴工业城市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议》精神，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后向国家计委作了《关于四川新工厂建设准备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汇报》，提出“应首先把德阳、绵阳和金堂三个城市建设委员会建立起来，并组织建立甲乙双方统一的党委会”。1956年9月26日，四川省委决定建立德阳工业区，建设重点为组建以航空420厂、电子711、776、780厂和航空工业学校、2417、2418、2419等3个航空工业技术学校（简称“4厂4校”）为中心的航空、电子工业基地。但到了1957年的9月19日，由于国家压缩工业基建规模，根据党中央“保障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和国家调整计划的统一部署，原定在德阳筹建的“4厂4校”建设推迟（1958年以后，420厂及4校迁成都，780厂迁绵阳，711厂及776厂迁山西侯马），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撤销德阳工业区。这就是德阳工业区建设历史中的“一上一下”。

（二）工业区的第二次建立与撤销

1958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同时由于德阳具备较好的发展工业条件和在德阳工业区第一次设立期间所奠定的建设基础，德阳工业区迎来了第二次上马的历史契

机。这次工业区建设的性质、类别和重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经过慎重的项目选点，决定把“二五”规划中的以万吨级水压机为中心的重型机器厂、大型水力发电设备制造厂等大型企业群集中布点在德阳。1958年8月12日，四川省委决定再次成立德阳工业区党委；次年7月21日，德阳工业区建委再次成立。但后来由于国家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德阳地区除重机厂和水力发电设备厂继续建设外，不再安排新建项目，德阳工业区于1960年6月29日被再次撤销。这也成为德阳工业区历史中的“二上二下”。

二、德阳工业区与德阳县的分工与协作

在德阳工业区“二上二下”的历史进程中，工业区与德阳县进行了分工与协作模式的不断探索，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调整。

（一）工业区与德阳县的分工

在决定建立德阳工业区的伊始，早在1956年11月，中共绵阳地委决定德阳县除少数服务于农村的单位仍由中共德阳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外，其余工作都交给中共德阳工业区工委和建委领导。根据分工，德阳工业区工委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领导工业区建委系统和中央工厂在德阳的各筹建机构、各技工学校、各建筑施工单位、国营机制砖瓦厂、地方德阳国营电厂、沙石厂、砖瓦厂、印刷厂、公私合营的农具厂、仁和印刷厂等，建委机关、德阳中学、孝泉师范学校等单位，以及城区服务性行业中的党的工作。”工业区建委的主要职责为“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在德阳的基建工程及建委系统的建设工程，管理规划区内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管理工业和城市建设以及重要的民用建筑用地，管理交通运输及其他公用事业的规划问题，管理规划区内的绿化工作，管理地方建筑队伍、地方国营电厂等。”自1957年2月，德阳县除服务农村少数单位外，其余工作都交给了工业区领导，德阳县主要工

作是配合支持德阳工业区的建设。

1958年8月工业区再次成立时，工业区与德阳县的分工也大致延续1957年德阳工业区与德阳县的分工。根据当时省委的决定，德阳工业区的资金调拨、物资分配、商品供应、计划关系采取过渡的办法，即在财政上与省财政厅直接挂钩，对德阳工业区的各种拨款单独划出，建立省属综合型单独预算。直到1960年6月德阳工业区再次撤销，将原属工业区的部分单位、学校、医院、企业等交德阳县人委，有些则并入其他国营企业和相关省直相关部门。

（二）德阳县与工业区的协作

德阳县与工业区的协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农业农村与工业企业的互相支援和共同推动德阳城市发展上。

1. 农业农村对工业的支援：土地征用方面，在德阳县委与德阳工业区党委、建委的具体领导下，仅1958年8月到1959年2月，工业区就征用了土地14645.36亩，其中工矿企业建设用地13005.57亩，占总征地面积的88.8%。劳动力方面，德阳县委积极组织本县广大群众参与工业区建设，其中农村劳动力组成了支援建设的强大队伍，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建起了一座座厂房和宿舍。建材方面，为保障工业区建材需求，德阳县从1958年7月起，用短短9个月的时间支援了德阳工业区建设稻草669万斤，山草200万斤，竹子254万斤，原木45580根，还有许多其他物资。农副食品方面，为满足德阳工业区建设者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德阳县截止1958年底，全县蔬菜基地播种面积扩大到5400亩左右，可以保证十万人常年蔬菜需要量；同时积极组织货源，保证了猪肉、食用油、食盐、棉衣、棉被等物资的保障供给。交通运输方面，建设初期，面对运输工具不足的情况，组织民工运输大军，带着自家扁担、箩筐、鸡公车等投入到支援工业区建设的行列。

2. 工业对农业农村的支援：一是支援建设地方农具厂，帮助农村进行技术改造。譬如从1960年1月起至1960年2月15日，德阳工业区各工厂、企

业等单位支援德阳各地各种机器设备28台、各种钢材70余吨，进一步更新了农业技术装备。二是进行技术指导，培训技术力量。譬如为提升劳动力水平，1960年1月，四川省绵阳专区德阳地区支援委员会协作会议在德阳工业区召开，明确德阳工业区各建设单位在代培农业实现“四化”方面所需要支援的各种技术力量，同时，应在建筑方设计施工、机械制造安装、水利灌溉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促进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3.协调配合推进德阳建市工作：一是干部交叉任职。为更好地推动德阳建市工作，工业区和德阳县委整合人力资源，对德阳工业区的干部采取照顾目前工作又结合将来业务的原则，能与县交叉的尽量交叉兼任，对工作部门不够的，采取在相关部门中多设副职进行分管去解决，使人力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譬如当时有一位干部准备建市后任市工业局长，就暂任工业区建委计划处处长，同时兼任德阳县委工业部长；另一位干部拟任市商业局副局长，就暂任工业区建委计划处副处长，兼任县人委商业局长等等。二是共同提出建市报告：为加快德阳工业发展，1958年11月15日，德阳县人民委员会向省人委、绵阳专署正式提出《关于撤销德阳县建制建立德阳市的报告》。1959年12月15日，中共德阳工业区委员会、中共德阳县委呈报《关于成立德阳市建制或德阳工业区与德阳县合署办公的报告》，提出为了加强工作的统筹协调，解决当时干部不足等困难问题，建议将德阳工业区和德阳县撤销，成立德阳市的建制。

三、工业区与德阳县分工协作的启示

德阳工业区与德阳县的分工协作实质是工农关系、中央厂矿支援地方关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区与德阳县的分工协作的融洽关系，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小地方嵌入大工业，农业必须大力支持工业，大工业必须带动地方发展，农业支援工业，工

业发展后必须反哺农业。1956年，德阳县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地方工业主要以酿造、碾米、油脂、印刷、烟业传统行业为主，仅有18个厂（社），工业基础薄弱。自省委确定在德阳建立工业区以来，地方农业倾尽全力保障工业区建设，促进了地方工业快速发展，特别是西南重型机器厂、德阳水力发电设备厂等中央企业建成后，极大提升了德阳工业化水平。同时，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地方农业的技术革新，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加速了农村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双赢。

（二）处理大工业与小地方关系要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协作、平等对待。一方面，德阳县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建设用地、劳动力资源，交通运输保障等。同时，为保障国家工业建设，地方工业企业的建设步伐也随之加快，地方国营德阳机制砖瓦厂、地方国营第一砂石厂、德阳水泥厂、采石厂等，最大限度保证了工业建设的原料供应。另一方面，为保障基建和生产的需要，工业区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出建设综合性联合企业。各建设单位必须按指定的原料产地与当地合作经营，这样既发展了地方工业又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达到了双赢共赢的目的。

（三）城市化与工业化要协调推进，城市化发展要适应工业化要求。随着工业区的加快建设，德阳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从1958年的2.5万人增长到1960年的9万余人，其中工业区职工人数达到4.5万人。为适应工业化发展需要，德阳工业区、德阳县委按照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推进的原则，积极完善城市配套设施。1958年到1960年，德阳县委共投资153.53万元，新建市政道路21867米，建成日供水3万吨的南塔水厂，学校、医院、京剧院等设施相继投入使用，进一步满足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生活需要。同时，为减轻重工业对城市的空气污染，按照德阳城市规划绿地用地占城市面积的20%的标准，大力推进造林工程，既为人民群众休闲提供了场所，也为促进工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作者单位：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三线建设在万源

文/王发祯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国际环境。东面处在美国军事势力的重重包围中，北方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西南方印度也对我国虎视眈眈。党中央和毛泽东面对险恶的国际形势，作出了加快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由于万源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优越，也成为了三线建设的重地。

万源赢得机遇

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国防工办派出领

导和专家对三线建设基地进行选址踏勘考察。毛泽东十分重视基地环境，提出了“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国家主席刘少奇要求“防空问题，大小三线要切实注意，要研究设计。靠山、分散、隐蔽，要采取措施”。1964年11月考察组将基地选址甘肃天水。1965年组建了O六二基地，开始了工艺设计和建设。1966年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3月11日，中央专委根据地质专家预测决定另行选址。3月15日下午，邓小平总书记在天水召集李富春、薄一波、谷牧、余秋里等领导开会，初步确定O六二工程

搬出天水，到四川省达县地区。3月30日，勘测人员在檬子垭招待所开会，认为万源地处大巴山腹地，千峰万壑、重峦叠嶂、奇峰如屏、地域辽阔、人口分散，具有天然隐蔽性，且曾未发生过地震，其人文地质优势符合国防工业建设条件。1966年6月14日，周恩来总理听取了中央专委汇报，决定“把一院的三线工程布局在四川达县地区。”O六二工程指挥部按中央要求，决定将工程基地建设在万源县白沙和八台一带。6月20日，天水7102工程筹建处人员分批撤离天水李子坝，来到万源白沙公社。6月28日下午，粟裕在国防工办召开三线基地座谈会，确定一院的点在川北不动，从而促成O六二基地最终在万源白沙落地开建。

三线建设大会战

1966年初，毛泽东主席发出“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1966年8至9月，从全国各地抽调勘测、设计和施工等专业骨干人员来到万源安营扎寨，扎根建厂。

O六二基地工程定点白沙后，基地建设遇到不少困难。白沙位于离万源20公里的大山里，境内无铁路，要从甘肃天水将大批物资运到万源，任务十分艰巨。当时O六二工程指挥部只有250辆汽车，只能满足一半需求。党中央立即从四川、吉林、安徽、山东等地抽调多个汽车队支援，仍困难重重。1966年4月到6月，从空军汽车1、3团、总后35、36团、空车直属队和导弹一师抽来了一批退伍汽车兵，又从天水召了一批退伍汽车兵，扩编成3个车队，组成“四队一厂”，拥有400余人的运输队伍。汽车队将天水的三线建设物资经广元、巴中、达县运到白沙。汽车队为赶运三线建设物资日夜兼程，“车上睡，渡口眠，为装头班货，为过第一船”，终年奔波。1967年11月18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同意国家拨给1500辆汽车，由总后接收，

组建两个汽车团执行基地运输任务，从重庆将三线物资运到白沙、八台。1968年1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调铁道兵六师修建重庆到达县段铁路，改变了达县地区运输条件。四川交通局也改造了汉渝公路和万白公路。

7102工程筹建处搬迁白沙后，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原则指导下，为早日拿出“争气箭”，以大庆人为榜样，艰苦创业，勤奋工作。1966年9月，国家建委土石方公司3000余人进入白沙施工。大批建工人员到白沙后，吃住都困难。于是土法上马，就地取材，在付家河上面小山头上建起一座500平方米的“干打垒”四合院。为解决O六二基地的用电问题，架设了重庆狮子滩到万源的11万伏高压输电线路，省电力局投资修建了万源发电厂。

1968年3月6日，国防科委决定146工程建在万源曹家大院，113工程建在付家沟，102工程建在蒋家沟、洋溪沟，141工程建在白沙冷沟。数万建设大军来到白沙的大山沟里，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劈山开路“三通一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热潮。O六二基地和7102厂修建期间，时逢“文化大革命”，一些“造反派”和武斗人员多次到厂围攻建设者。毛泽东主席为排除干扰，决定对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或直接派军队施工。在军管会领导下，在地方党委、政府、军队的大力支持下，O六二基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72年底，先后完成30余万平方米的施工任务，70%的土建工程转入安装交付阶段。1974年12月12~18日，四川省七机局（即O六二）在7102厂召开了“六个月改变面貌”总结大会，使O六二形势稳定，基建生产向前发展。1976年7月22~28日，七机部副部长汪洋，国防科委副主任马捷带领国防科委、七机部机关工作人员24人到O六二检查工作，肯定了所取得的成绩。1978年1月23日，O六二指挥部将7102工程列为重点，要求1978年完成任务。1978年重庆安装公司完成安装任务，退出

施工现场。工程兵 883 部队一个团进入现场施工，加快了建设速度。由一院一部包建的 7146（总体部）于 1979 年竣工验收；由 211 厂包建的 7102 厂于 1983 年建成。1983 年 1 月，O 六二基地向航天部写了竣工验收报告，航天工业部验收委员会认为工程质量好，符合科研使用要求，同意验收。1984 年 4 月 25 日，O 六二基地向航天部竣工验收委员会写了 7102 厂的竣工验收报告，航天部批复了验收报告，认为工程质量良好，同意验收。

万源对三线建设的支持

万源县委、县人委对三线建设极为重视，认为既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也给万源发展带来机遇。万源县广大干部群众大力支持，并积极投身于三线建设。

为加强对三线建设支援工作的调度指挥，1966 年 11 月 21 日，万源县成立了支援重点建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接洽联系，处理日常具体工作。

三线建设中，涉及最多的是征用土地和住户拆迁。O 六二工程建设需在白沙、八台征地 219.66 亩，修襄渝铁路万源段需征地 2984.26 亩，汉渝公路加宽改造、建万源发电厂和部队修营房等需征地 1283.69 亩，县委、县人委（县革委）及时研究，给予解决，保证了建设顺利开展。

三线建设工程定点万源后，工程项目、工程量逐渐增大，需要大量民工。万源县委、县革委根据建设需求，积极调集劳动力全力保证工程建设。1966 年为保障 O 六二工程运输，需加宽改造和修建公路，县委、县人委立即从各公社征调民工 3000 余人，分赴各地抢修公路。1970 年，4832 部队需 3000 名民工修重点工程，县革委立即从全县抽调一批劳动力前往施工。1973 年，O 六二工程需要一批技工，县委、县人委从各公社和基建队挑选了 500 名“五匠”人员前往

抢建工程。县委、县人委对重点工程所需人员都及时调配，为按时完成工程任务提供了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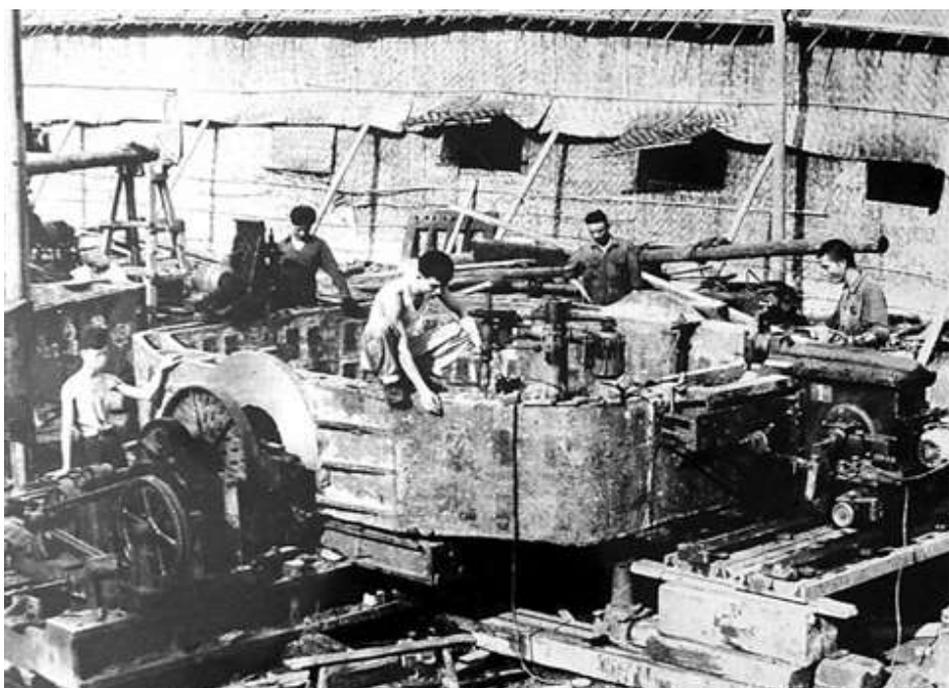
三线建设期间，大量的三线建设者来到万源，万源县委、县人委千方百计当好后勤，保障了工程建设者的物资供给。1968 年 3 月 29 日，万源县人委为保证蔬菜供给，除长青公社 250 亩蔬菜地外，又在城郊和工矿区附近安排 15 个生产队作专业蔬菜队，新增 1500 亩蔬菜基地。1972 年 3 月，县人委生产组为保证三线建设蔬菜供应，又增加规模种植，除原有 21 个专业蔬菜队外，又在三线建设工程所在地附近增加 12 个专业蔬菜生产队，保障了三线建设和城镇干部居民的蔬菜所需。为解决三线建设者的肉食需要，1968 年 12 月 30 日，县人委生产组颁发通知，要求组织好肉食，优先保证军需和重点建设单位。县肉品公司在白沙、八台设立了经营站，专门为重点工程职工服务。

三线建设助推万源发展

三线建设重点工程基地落户万源县后，从资金、物资、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给予地方大力支援，带动了当地交通、电力、工业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促进了万源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万源地处大巴山区，交通运输条件差，国家投资修建了襄渝铁路和万白铁路支线，改造了汉渝公路，除保证了基地运输需求外，也改善了万源交通落后的状态，打破了制约万源经济发展的“瓶颈”。襄渝铁路万源段 1978 年 6 月 1 日正式由郑州铁路局安康分局万源车务段接管营运，县境内铁路营运里程 94.972 公里（含万白铁路），7 个三、四级火车站。随后又修建了青花铁厂专用线、513 发电厂专用线和官渡乡镇企业专用铁路线，不仅方便了人民外出旅行，而且将工业原料、人民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源源不断运进万源，将万源的土特产和煤炭生铁等产品运到外地，为万源资源开发打

下了基础。随着汉渝公路、万白路的加宽改造，加快了县、乡公路和企业专用道的建设。从1975年到1985年修县道7条188.6公里，乡道18条222.9公里，厂矿道13条53.4公里，乡镇企业专用道25条175.9公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改变了万源过去交通落后的面貌，为加快山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火如荼的三线建设工地。

万源工业生产发展缓慢，三线建设需大量物资，O六二基地先后投资45万元、万源投资5万元在官渡公社周家湾建了年产500万匹砖的万源机制砖厂，所产砖供O六二基地建设。O六二基地投资100万余元支持兴建了万源水泥厂、东风坝水泥厂、白沙水泥厂和八台水泥厂，所产水泥既解决了基地建设所需，也支援了乡镇企业发展。O六二基投入大量资金，打深井、修水池，架电线，修建给排水系统和供电系统，除解决了工厂自己使用，还解决了厂附近农民生产生活的用水用电问题。到1966年全县有小型电站17处，装机19台，年发电量100万千瓦时。1971年万源发电厂建成投产后，各地水电事业也加快了发展，到1993年，万源建成小水电站50处，装机60台7259千瓦，年发电2836万度，架设高、低压输电线路2441公里，不仅让42个乡（镇）281个村、73083户农村居民用上了电，还保证了企业用电，加快了企业发展的步伐。

基地根据国家“还田于农”的政策，先后无偿支援白沙镇炸药20吨、水泥200吨、煤炭100吨、水泵2台和各种管道物资。并帮助附近3个村拦河造田200余亩，修建鱼塘水面100余亩。白沙从万源析出组建白沙工农区时，O六二基地无偿支援各

类汽车50辆。基地创建30年，多次派汽车帮助地方运送种子、化肥、农药、水泥、炸药等支农物资，大支援了当地农业生产。三线建设重点工程对万源农业的大力支援，改善了企业附近农村的生产生活设施，确保了农业丰收和农民增收。三线建设者对蔬菜肉食的大量需要，刺激了农民种菜、养猪养禽的积极性，培养了农民的市场意识，增加了农民收入。

7102厂所办社会机构，不仅解决了职工所需，也满足了基地附近居民需求。基地所办的学校，解决了附近农民子女“入学难”的问题，为地方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O六二基地在白沙建立了七一二医院，因医疗设备齐全，医疗技术好，解决了山区就医难的问题。102医院设备齐全、医疗技术雄厚，在保证职工医疗基础上，还为当地人民服务，收治病人100万余人次。1978年，7102厂在八台山顶建起了电视差转台，覆盖了万源60%的地区，让白沙、太平镇、罗文、官渡、旧院等区看上了电视，为万源电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万源市委党史研究室）

20世纪末四川扶贫攻坚（1978—2000）（下）

文/曾凡荣



四、扶贫开发的主要方式

扶贫开发工作有极高的社会关联度和参与度，同各项社会事业一起不断与时俱进，时代进步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工作方式和重点也不断发生变化。

（一）扶贫到户

从1984年实行开发式扶贫起，省、市（地）、州）、县扶贫办在组织实施扶贫开发中，始终把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作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基础产业、作为尽快解决贫困人口温饱的首要措施。1986年，省委提出在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解

决吃饭问题的基础上，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贫困山区畜牧业发展，大力发展林果业。1991年11月，省政府就“八五”期间搞好贫困地区区域性支柱产业发出通知，明确提出90年代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首要措施是坚持发展种养业。1994年9月，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四川省七一一八扶贫攻坚计划》也把“发展投资少、见效快、覆盖广、有助于直接解决群众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的加工业”作为扶贫攻坚的基本途径。

1988年4月，省委、省政府在《关于加速贫困地区开发步伐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大力推行依靠农工商经济实体和服务组织对贫困户实行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综合输入，搞好产前产后服务并包

干扶贫。进入90年代以后，各地把扶贫与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对具有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农产品生产，按照产业发展方向，连片规划建设，形成有特色的区域性主导产业。

1996年11月，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全省从省、市（地、州）、县、乡四级党政选派了2.10万名熟悉农村工作的干部进驻9497个贫困村，其中5000名左右的中青年优秀干部在贫困村任职或挂职，开展驻村帮扶活动。

发展庭院（池园）经济庭院经济是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下，以户为单位，开发各具特色的商品生产，由千家万户小商品生产形成大产业的一种经济形态，也是扶贫到户的一种好形式。苍溪县开展以户为单位的小果园、小桑园、小茶园、小林园、小鱼塘的“五小”建设，以发展商品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巴中地区于1993年积极开展改水、改田、改土、改革耕作制度和以户为单位建设池园经济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1997年，巴中地委、行署在总结群众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设以池园经济为特色，以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建池、建园、建家为内容的“文明新村”扶贫方式，改变农村贫困面貌。

1994年，省扶贫办决定在凉山州开展移民扶贫的试点工作。1994—2000年，凉山州先后建成31个集中安置的移民点，安置高寒山区贫困群众5676户、2.72万人。改田改土3400公顷，新建人畜饮水工程27处、新建水利设施6处、新修乡村道路60公里、架设输电线路40公里、新修学校3所、建医疗点2处、建卫星地面接收点2处、退耕还林还草20万亩。

（二）发展县域经济

1984年8月，省委、省政府决定，贫困山区县引进外省、外市资金合办合资、合作企业，前3年免征工商所得税，之后可以视情况给予减免税照顾。乡镇企业纳税按新8级累进税减半征收，新办乡镇企业免征所得税3年。企业经济效益好，还款

有保证，可以降低自有资金与贷款的比例。集体企业贷款技术改造项目的新增利润实行税前全额还

全省贫困县的工业经济通过扶持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1993年与1985年相比，69个贫困县的工业总产值由48.25亿元增至265.80亿元（均为当年价），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8%增至52.55%，财政总收入由5.19亿元增至25.42亿元。2000年与1993年相比，63个贫困县的第二产业增加值由56.01亿元增至167.10亿元，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25.61%上升至27.11%，增长1.50个百分点。古蔺、叙永、苍溪、南部、阆中、宜宾、广安、宣汉、渠县、巴中等县（市、区）财政收入突破了亿元大关。

大力扶持区域性支柱产业。四川省在1990年7月发出的《关于90年代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八五”时期的扶贫工作要以种养殖业为基础，大搞开发农业，发展立足一地、兴办一业、带动一片的区域性支柱产业，由单纯生产原料向加工业延伸，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把富县同富民更好地结合起来，为初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打下基础，四川省贫困地区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取得了明显成效。

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双非”经济，四川省在扶贫开发中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开发非耕地资源，将此作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增加贫困户收入、开辟贫困县财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省委、省政府在“七五”、“八五”时期以及扶贫攻坚阶段，都把“贫困户人均有0.5—1亩的稳产高产粮田”作为贫困户解决温饱的基础条件之一列在首位。从1984年冬开始，四川省以国家实施以工代赈为契机，集中力量持续开展以改造中低产田土、兴修水利为主的基本农田建设仅1990—1994年，就投入资金4.82亿元，投工2.28亿个，共建设基本农田12.17万公顷，1994—2000年扶贫攻坚阶段加大了建设基本农田的力度，7年间累计改田改土

46.41万公顷。

全省贫困地区遵循“治水兴蜀”的指导思想，推广巴中经验，以农民投资投劳为主、国家补助为辅，大力开展打井建池（窖）微型水利设施建设。1994—2000年，贫困县兴修小型水利工程2000多处，扩建、整治水库330座，整治渠4209公里，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27.30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546平方公里，兴建以微型水利工程为主的各型水利设施295万处，在老旱区基本做到了1户1井1池，既解决了人畜饮水，又能抗旱保苗，发展畜牧业和水产。

在交通建设方面，恢复和开发山区水运，组织船队出川，扶持集体、个体、联户发展水上运输，公路建设上坚持抓好联网路、资源开发路和富民路，把打通贫困地区出口公路、提高公路等级和抗灾能力，保证贫困地区有1条在非特大灾害下能够通行的公路作为重点，多方集资，加快建设。据四川省以工代赈办公室统计，1984—2000年全省通过实施以工代赈建、改建公路2.86万公里；建成公路桥梁2486座、8.51万米；公路隧道46处，总长1.12万米；人行桥147座，人行路19条、210公里；小码头和船闸113座，整治航道842公里。

开展形象扶贫。1991年根据省委领导的意见，省扶贫办在凉山州实施形象扶贫工程试点。至2000年底，全州已有32.82万户农户实施了形象扶贫，占全州应实施农户的101.73%，实现了省委、省政府到2000年底完成95%的要求。

“人草畜三配套”工程。20世纪90年代，甘孜州和阿坝州在牧区全面落实草场有偿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开展了牧区“人草畜三配套”建设。至2000年底，甘孜州在除泸定、得荣两县外的16个县累计建成“人草畜三配套”户4.17万户，占全州纯牧户的89%，占全州应建户数的100%。共建定居住房310.50万平方米、户均74.50平方米，建围栏草场8.63万公顷、户均2.067公顷，建饲草料基地1.27万公顷、户均0.31公顷1建牲畜棚圈513.6万平方米、户均123.2平方米。阿坝州从1996年以来多渠道筹集资金10多亿

元，在全州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牧民有住房、牲畜有棚圈、草地有围栏、冬春有贮草”为主要内容的“人草畜三配套”建设。至2000年底，全州建成“人草畜三配套”户3.28万户，占应建户的97.30%。共建定居住房246.22万平方米、户均75平方米；牲畜棚圈321.41万平方米、户均98平方米；共建成人工割草基地26.24万亩、户均8亩。

（四）劳务扶贫

从1991年开始，四川先后同湖南、广东等9省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劳动力区域协作网络。外出务工使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部分农民实现了小康生活，不少贫困农民外出务工，使家庭“一年吃饱饭，二年穿新衣，三年盖新房”。省扶贫办统计，1993年贫困地区劳务输出300多万人次，汇回现金30多亿元。1994—2000年间，劳务输出声势更大，7年时间内全省63个贫困县累计转移劳动力2445万人（平均每年349万多人），累计总收入557.42亿元（其中从邮局汇回301.93亿元，平均每年汇回43亿元），相当于63个贫困县7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21.55%。

五、扶贫开发的典型经验

四川省委、省政府注重更新观念，及时推广总结各个时期涌现出的苦干实干典型，激发了贫困主体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这一期间，四川在全国叫得响、有较大影响的典型主要是黔江精神和巴中经验。

（一）黔江精神

地处川东武陵山的黔江地区曾是全国自然条件最恶劣、人民生活水平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全区所辖的酉阳、秀山、彭水、黔江、石柱5县，都是少数民族县、国定贫困县、大石山区县。1987年，5县有100万人闹饥荒、4万多人住岩洞或窝棚，60万人患地方病，110万人饮水困难，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才182元，人均占有粮食不足300公斤，全部

指标都在国家划定贫困地区的标准以下

1988年黔江地区成立后，黔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1995年与1987年比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23元、增长3.52倍，人均占有粮食由292公斤增加到508公斤，农村居民存款余额增长了4.05倍，65万人解决了饮水困难，4万多住岩洞或窝棚的人迁进了新居，188.70万贫困人口的温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其中60万人全面达到国家确定的温饱标准；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年递增12.90%，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18.60%，财政收入年递增22.30%，这些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黔江精神的内容：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求真务实、苦干实干，团结进取，敬业奉献。黔江精神的精髓，就是苦干。“宁肯苦干，不愿苦熬”，这是黔江人自己起来同贫困作斗争的宣言。

（二）巴中经验

地处川北秦巴山区的巴中于1993年10月建区，该区是四川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人民生活比较贫困的地区之一，全区4个县（区）既是革命老区县（区），又都是贫困县（区），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占71.40%。建区前的1992年，全区有农村建卡贫困人口91万，其中3100多户还住着窝棚或岩洞；近20万人患地方病，93万人、8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农民年人均纯收入497元，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足300公斤，全部指标都在国家划定贫困地区的标准以下。建区后，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省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区干部群众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艰苦奋斗，苦干兴区，靠实干改变了贫困面貌、大干促进了大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998年与1993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0.30%，第一产业增长35.30%，第二产业增长88.90%，第三产业增长1.20倍，财政收入增长1.20倍；粮食总产量由117.20万吨增加到160.50万吨，增长37%，人均占有粮食达到500多公斤；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200元，增长1.40倍，71万贫困人口基本解决温饱。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大、步伐快、面貌大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巴中经验的内容主要有：公路建设—把改善基础设施作为扶贫攻坚的基础工程来抓，在全区建成“快速、方便、舒适、安全”的交通网络。微型水利—发动千家万户大搞微型水利，在房前屋后打水井、建水池，解决了饮水和灌溉困难。池园经济建设—“井池园机配套、种养加运结合”，把千家万户打井、建池、修路、办园、发展小型农机与发展庭院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运销业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池园经济”。文明新村建设—从1997年到2000年，全区有2205个社完成新村建设，占社总数的15%。新村建设是巴中经验的核心内容。调整产业结构—改革耕作制度，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猛攻旱作农业，大力发展玉米生产，使巴中地区粮食产量在连年遭受旱灾的情况下保持了稳定增长。开发人力资源—全区公路建设5年共投入14.80亿元，农民投劳折资达6.25亿元，占交通总投资的44.39%，发动农民利用空闲时间改善自身的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开展劳务输出，全区劳务输出由1993年的28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55万人，5年间劳务总收入达50多亿元。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动员全川力量驰援全国抗日

——评《抗战时期的中共四川组织》

文/龚自德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中，四川占有重要分量，四川是民族战争大后方的主要基地，无论兵源、粮源都是全国之冠。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全国战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大后方的战略要地，因此，四川也就成为日军大轰炸的重点地区。四川的损失和牺牲极为惨重，但四川人民冒着空袭的威胁，仍坚持生产，支援抗战。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中指出，五千万四川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对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隆重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四川今年也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尤其是9月7日，省委举行了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等领导看望了抗战老战士、老同志，高度评价了四川人民在抗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号召全省各族人民要积极投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川实践，为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而努力奋斗。

作为曾经并非直接抗日战场的四川，我们如何传承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贡献及精神，一直是我思考

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出生在抗日战争后期，幼年经历过四川抗战岁月的一位党史工作者，也长期致力于四川抗战研究，这不仅仅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还是一份使命和责任。

在全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氛围中，更让我感到欣慰和激动的是一大堆纪念抗战的研究成果得以出版，研究四川抗战的成果也有一批。因为与自己的研究领域相关，所以我重点关注了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编著的《抗战时期的中共四川组织》（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也是近十年来对于四川人民和中共四川组织在抗战中的作用及贡献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书中成果弥补了此前四川抗战研究对大后方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动员和组织人民抗日研究不足的缺陷，在史料发掘上有新发现，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上有所突破，既有丰富的史料，也是研究论文，也是信史，对于传承抗战精神，深化抗战研究均有裨益。

一是本书集中反映了四川各级党组织整合、动员各方力量，成为中国大后方抗战凝神聚气的主心骨的过程。中华民族的抗战不是片面抗战，而是全面抗战，身处大后方的四川各级党组织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抗战路线，不仅巧妙推动川军上层将领支持抗战，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四川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推动了川军出川奔赴全国各大战场抗日。而且，各级党组织从村乡场镇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宣讲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传递前方抗战真实情况，讲群众心里的话，取得群众信任，从而做到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与国民党拉壮丁、苛捐杂税形成明显对比，能够有效动员群众自发捐金献物，积极报名参军抗战。书中选取了研究市（州）党组织发动全市（州）抗战的实例，深入介绍了一批县级党组织动员抗战的经过和实效，此外还研究了有代表性的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如何组织民族同胞抗战，学校中党组织如何动员青年学生走上抗日和革命的道路。不同层面的成果使得全书的研究更为立体，能从一个村、学校到县，再到市，直到省级层面呈现中共组织如何发动各阶层参与抗战，这是全书的最大突破和亮点。

二是集中展现了党组织领导全川抗日救亡运动，使四川成为当时除延安之外的又一个抗战文化中心的真实面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组织在四川没有根据地，没有延安那样的局部执政条件，因此党不是靠各级政权组织和行政力量来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抗战，而只能依靠开展和发动一场群众认同的文化运动来反映群众的心声和诉求，以老百姓的语言表达老百姓的声音，让群众在比较中认识到谁是真正的抗日者，谁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谁能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抗战胜利。这个过程在之前的四川抗战研究中没有系统的研究，这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辑录了对此展开研究的18篇论文，领域和地域互不重复，因此也就成为18个样本，有报刊、国立中学、县级党组织、抗战时入川高校、市级党组织、省级党组织和南方局等多个层面，代表性强，视域广阔。各级党组织普遍组织了《家破人亡》《壮丁》《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等

抗日剧目的演出，普遍开办了抗战宣传阵地，在农村表现为壁报和宣传画等，在城市则发行报刊，在组织上出现了城呼队、剧团和剧社的文化宣传队伍，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抗日前途，将延安的革命新风吹进了四川城市和农村，包括全省民族地区。一大批文化名人和文化机构迁入四川，一大批抗战剧目在重庆和成都等地公演，抗战文化在四川大为兴盛，成为激励后方人民咬紧牙关支持抗战，推动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战，激励其他各条战线抗战到底的文化支撑和心理支撑。

三是展现了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的川籍共产党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英雄史歌。在抗日战场的最前线，一大批四川籍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着彪炳千秋的历史作用，成为抗战史上耀眼的群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师政委邓小平，新四军军长陈毅，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罗瑞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张爱萍，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王维舟……巴蜀将星云集耀中华。书中着重选取了朱德、陈毅、吴玉章、王维舟和赵一曼等几位川籍抗日共产党人的光辉代表，从抗日后勤保障、新四军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陇东抗战贡献和东北抗日联军等与四川籍共产党人关系的角度展开阐述，以个案的方式娓娓道来川籍共产党人在抗日一线的英雄事迹和精彩人生。这些川籍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英勇投身于抗日战争，处处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历史虚无主义有所抬头，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否认侵华历史、妄图篡改历史的今天，《抗战中的中共四川组织》一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四川传承抗日精神、铭记抗日光辉史实，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以史为鉴”也不是仇恨的延续，而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在教训中求得国家的稳步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坚持“三个自觉” 服务中心工作 奋力谱写攀枝花党史工作新篇章

文/熊伟

攀枝花各级党史部门抢抓机遇，创新思路和举措，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年来，中央、省委对党史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新形势下党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观点、思想和要求，省委召开常委会对全省党史工作作出了全方位部署，焕发了党史研究工作的又一轮春天。今年攀枝花聘请了十名首批特约党史研究员，更为构建“大党史”格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中国三线建设研讨会在攀枝花召开，就是我市党史工作研究拓展领域、丰富内涵、延伸外延的集中展示。

一、增强党史自信，自觉把党史工作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党史工作者而言，就是要增强党史自信，这是对“四个自信”的具体化。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工作要坚持辩证唯物法，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新党史工作的手段、方法和载体。关于党史自信的来源，体现在“四个把握住”：

第一，把握住党史工作的根本方向。党史工作的研究方向是政治方向，是根本问题。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栗战书同志指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党史部门、党史工作者具有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重要论述，内容丰富、思想博大精深。去年底，中央党史研究室从总书记100多篇讲话、谈话、演讲等文稿中摘选了300多段重要论述，印制了《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论述摘编》，很值得大家认真细读、精读。全市党史系统

要不断增强政治自觉和政治敏锐性，不断增强党史理论素养，坚持知行合一，坚持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党史工作实践。

第二，把握住党史研究的总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工作的中心是党史研究。中央提出的“一突出、两跟进”（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研究，即时跟进党中央步伐，即时跟进历史步伐），是整个党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路径。具体到攀枝花，要紧紧抓住“两个板块”：一是开发建设史。攀枝花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其诞生与成长，与三线建设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可以说攀枝花就是三线建设成果的缩影和代表。攀枝花历史的核心是开发建设史，必须把三线建设史作为党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二是改革发展史。党史工作要紧跟时代的步伐，时刻关注市委市政府的重大改革、实践发展、理论创新，做到即时记录、即时收集、即时整理、即时思考、即时研究。攀枝花的《大事记》《思想的火焰》很好，但还要不断探索和拓展，提升内涵和可读性。

第三，把握住党史姓党的政治逻辑。党史姓党，是党史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党史工作的生命线。党史部门是为党修史立传的，是为党修“红色家谱”的，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史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强化党的观念，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客观准确地反映和记载党的历史，科学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绝不能违背中央精神，犯个人主义或陷入个人偏好，导致偏离方向，在政治上犯错误。

第四，把握住开门修史的时代需求。党史研究要特别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片面思维，不能就事论事、见子打子，要

有全局眼光。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要摆脱闭门修史、关门造车的惯性思维，占领和利用互联网、微信等新兴媒体阵地，宣传党的主张、路线、方针、政策。党史工作者要多走出去实践探索，多听一听、看一看，多收集归纳整理，提升党史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二、突出资政育人，自觉把服务大局当作政治责任来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史姓党”“党史是必修课”“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这深刻阐明了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在党的工作全局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各级党史部门要把党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服务科学发展上，重点抓好“三项主业”：

一是立史存史。历史资源是特殊的资源，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现在不收集好、整理好、保存好，时过境迁就无法弥补，对此，大家一定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感。马克思曾说过：“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党史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担当，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加强理论借鉴。党史理论借鉴要着眼于党史研究的史学定位，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法的同时，合理借鉴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为党史研究成果提供有力的手段和载体。二是要做好征集编纂。积极打造党史数字化平台，大力开展对攀枝花党史人物、重要党史事件的深度研究，高质量形成《三线建设在四川》（攀枝花卷）、《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历史日志》、《攀枝花五十年：建设者回忆录》等著作，多出党史资料征编和党史研究精品。三要挖掘本土资源。坚持走出去、请上来、坐下来等形式，多渠道、多途径寻找挖掘党史资源，用好三线建设博物馆、渡口十三栋、大田会议遗址这三张攀枝花党史的名片，精心呵护、保护攀枝花宝贵的文化遗产，提升品质和品味。四要重视资料抢救。党史资源一旦流失就会消失，特别是要加大老一辈建设者

的个人物品、口述史料、回忆录、照片等资料的征集整理力度，对健在的、能够见证攀枝花发展历程的老干部、老党员、老同志，要多走访、勤访谈；对已经逝去的，要多去拜访他们的家人和亲属，尽可能掌握全备的党史资料。

二是以史资政。党史部门的职能和优势所在，党史工作者实现自身价值的根本途径，就是资政辅政，为时代中心大局服务。要重视党史正本研究。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紧密结合，编写好地方党史第一卷、第二卷、《执政实录》等，在体例、编排上下功夫，记录好党委政府的重大决定、重要部署、重大实践，特别是对攀枝花举办的中国钒钛产业博览会、中国康养产业论坛、中国三线建设研讨会等三个“国字头”的会议等，要大书特书。要重视现实专题研究。紧跟市委扶贫攻坚等中心工作、重点项目和交通、民生等热难点问题，以党史部门独特视角，用历史的经验教训说话，提供一批有理论深度、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资政报告，为党委决策提供良好服务。要重视攀枝花精神研究。历届市委、市政府都强调传承弘扬攀枝花精神：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科学求实，这“5词20字”承载着攀枝花人的记忆，是攀枝花城市精神的核心。党史工作要加强攀枝花精神的培育和教育，用攀一代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一代代攀枝花人砥砺前行。

三是以史育人。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把党史教育宣传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等结合起来。要把党史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必修课。攀枝花市一直把党史教育作为各级各类干部培训的重中之重，组织干部到延安、井冈山、山东临沂等革命老区开展党性锻炼。攀枝花党史教育要依托三线建设博物馆、大田会议遗址等本土资源，探索开展现场参观、小班讨论、专家授课等，打造体验式教学点。要着眼于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党史作品。有针对性地将党史编研成果转化为符合不同层次人们学习、了解党史的理论读物、电视片、微电影等党史文化系列“产品”。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史宣传教育阵地。推进党史宣传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等，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广播等传统

媒体，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不断扩大主流党史信息传播渠道，主动占领党史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党史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三、培育党史文化，自觉把党史工作当作崇高事业来追求

党史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努力提升到一定的境界和高度，从形成党史文化角度来思考和推进。希望做好四个方面，即“四个重视”：

一要重视党史文化氛围营造。有文化的事物才有生命力。从政党角度看，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文化来为继和引领，都会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品格，这种特质和品格就是组成政党文化的“基因”。攀枝花党史文化的“基因”就是开发建设史，要以此为核心营造氛围、形成体系，增强攀枝花人的文化归属感。

二要重视党史研究方法。好的方法是党史工作的看家本领。要大胆借鉴各种研究方法，比如历史比较方法，三线建设全国14个省都有，但主战场、典范和缩影在攀枝花，侧重发现差异性；比如计量史学方法，将定量史学方法与定性史学方法有机结合，使党史研究成果更具真实性、准确性和可读性；比如口述史学方法，面对面交流获取“第一手资料”；还比如心理分析史学方法等。党史研究工作要拓展，不仅是人和事的简单记载与记录，还要能够挖掘开发建设史背后深沉轨迹和厚重内涵，推进党史研究的沉淀和升华。

三要重视党史成果运用。党史研究成果有四种基本类型：党史专著、论文，党史编年史和专门史，党史人物年谱、传记，党史大事记和文件汇编等等。党史研究成果的转化至关重要，既要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也要为人民群众普及党史知识提供载体，还要为攀枝花精神提供文化传承。要高度重视党史成果的运用，运用要紧跟时代的节拍，突显为中心大局服务。

四要重视党史队伍建设。全市党史系统是一个战斗集体，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党史研究摆上重要议程，听取专题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党史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真正做到“党有所需、史有所为”。市县两级的重大活动、重要会议和重点项目，党史部

门和党史工作者要主动介入、主动收集，不能守株待兔。各县区、各部门（单位）要为党史工作者创造条件 and 畅通渠道，不能有中间梗阻。党史部门不是闲人养老的部门，要把喜爱党史、对党史有兴趣的同志充实到党史队伍，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党史骨干、党史专家、党史名家。要把优秀的党史干部纳入年轻干部递进培养计划，建设一支强大的党史队伍，形成合力、形成“拳头”，推进党史工作上水平、上台阶。

党史工作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党史工作者的能力素质、精神状态、干事心态要求很高。这里对大家提四点希望和要求：

一是既要讲经历更要讲阅历。阅历是一个人经历的积累和沉淀，没有一定的经历、阅历，就很难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驾驭全局。党史工作者没有足够的阅历，就很难写出有深度的党史作品。

二是既要讲开化更要讲文化。开化是一种开放的心态，文化是一种积淀、素养。现在强调通识教育，党史工作者要提升通识素养，既要术业有专攻，又要博采众长、博览群书，这样写出的文字才有重量、分量和质量。

三是既要讲功劳更要讲苦劳。党史工作者很不容易，需要组织更加关注、关心和温暖。选择了党史工作就是选择了孤独和寂寞，选择了清苦和辛苦，就肯定当不了大官、赚不了大钱，但可以在岗位上体现人生的价值，无悔青春、无悔岁月。

四是既要讲干事更要讲干净。党史部门虽然是清水部门，但如果长期不呵护，“清水”也会变成“浑水”。要守好底线、不踩红线，踏踏实实做事、干干净净做人。

总之，党史工作部门必须树立“大党史”的工作格局和理念，加强与组织、宣传、档案、党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联系协作，充分发挥离退休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的作用，加强与党史之外其他领域专家的合作交流、启迪借鉴，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加快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史部门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大党史”工作格局，发扬“安专迷”精神，让自己的人生在党史研究的岁月河流中得到冲刷和洗涤，让自己的人生之路充实而值得。

（本文作者系中共攀枝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如何正确认识党史工作

文/白冰

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把握自己历史的发展规律，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我们正确的未来走向。历史是我们民族的根、党的根，也是我们民族的魂、党的魂。

如何正确认识党史工作？笔者认为：

一、明确要求党史部门融入党委的中心工作

党史姓党。无论是走基层对联系乡镇进行“精准扶贫”工作，还是开展以“为官不为或乱作为、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为主题的专项整治行动，党史工作者都要主动融入，积极参与。通过联镇帮村扶户、民主生活会、“基层夜话”等，认真学习讨论，查摆自身和单位存在的问题，拟定整改措施，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和区委的工作部署。一边亲身体会区委的中心工作和社会实践，一边收集整理党史资料及区委大事记，既充实了党史部门的工作内容，防止闭门造车，又提高了党史人的政治觉悟，加深对忠诚、干净、担当的现实理解。

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党史部门的工作重心

党史工作必须紧扣“资政育人”。要引导抓好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扎实做好《执政纪要》等基本著作的编撰工作。要强调党史宣传工作。今年，区委党史研究室报送的《五通桥区党史宣传工作凸显地方特色》《五通桥区委党史研究室突出抓好“三线建设”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两篇信息被“四川党史文献网”采用，纪念文章《飞虎英烈浩气长存》由《四川党史》登载。要选准做好资政专题。年初，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五通桥区委党史研究室一道共同研究的专题调研课题——《关于乐山党史遗址与红色旅游的调查报告》如期完成。

三、努力探索和创新党史宣传教育的方法途径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史部门应自我加压，创先争优。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区委党史研究室请示分管领导，准备以美军抗日飞机坠毁我区这一历史事件为依据，在蔡金镇永镇村打造一座党史教育基地。我区大力支持，并耗资6万元，打造这处遗址。修建“虎憩亭”，亭上题写楹联一幅：此地有虎威长存，世界得和平久远。党史部门在党史宣传教育方面要尽量采用电子素材和音像制品，上党史教育课要制作PPT课件，宣传上要制成专题片，年内，区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组织部、民政局、档案局等多个部门连续拍摄了三部党史教育片：即《五通桥区抗战老兵回忆录》《为了和平》及《百年新塘沽 民族化工魂》。

四、认真思考和制定党史部门工作的长远规划

明年，也是党史部门工作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为此，要落实分管者的领导和督促责任。一是个人需要牢固树立党史部门“一个突出、二个跟进”的工作思路，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学习党史、国史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提高自己学习党史的自觉性和发挥对党史工作的领导作用。二是要求党史部门制定《2016~2020党史工作规划》，把补充完善修订党史基本著作放在首位，抓好来年《区委执政实录》的编撰工作。三是为党史宣传教育工作多出“金点子”。

总之，文化要靠历史去传承，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党史工作者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的形势下，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责任。

（作者单位：中共乐山市五通桥区委）



乐山市
五通桥区

“308”三线军工暨永利川厂旧址

“308”三线军工暨永利川厂旧址位于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镇，其所属的东方电气集团东风电机有限公司是能够同时寻找我国近代工业、现代工业和当代工业发展轨迹的罕见之地。

旧址主要有三个展示区：民族工业展示区、三线军工展示区和当代装备工业展示区。民族工业展示区主要包括“新塘沽”石碑、石（砖）木结构厂房群、永利川厂员工住宅群等组成；三线军工展示区主要包括山洞军工厂房、军工总装车间、“干打垒”简易住房等组成；当代装备工业展示区主要由目前优美的厂区、繁忙的现代装备生产场景、企业中心文化群雕等构成。三个展示区和厂史陈列室等一起，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业在此地的三个发展阶段所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308”三线军工暨永利川厂旧址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乐山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新塘沽石碑。



丁佑君烈士纪念馆以及丁佑君塑像



党和人民的
好女儿——丁佑
君铜像



胡耀邦总书记亲笔题名的“丁佑君纪念馆”。

丁佑君烈士纪念馆坐落于乐山市五通桥区菩提山森林公园内。

丁佑君（1931—1950），女，别名丁一之，乐山市五通桥区瓦窑沱人。丁佑君于1944年入五通桥通材中学就读，1948年就读于成都市女子高中，深受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成都解放后，丁佑君立志献身革命，考入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丁佑君担任西昌女中军事代表。1950年9月19日，丁佑君在西昌盐中区征粮工作中，不幸为暴乱叛匪围捕残虐杀害，牺牲时年仅19岁。9月25日，丁佑君被中共西昌县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

丁佑君烈士纪念馆建于1985年，占地面积22926平方米，建设面积776.76平方米，绿化面积350平方米。纪念馆内陈列着丁佑君烈士遗物24件、介绍生平事迹和反映五通桥区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内容的展板45个，朱德、胡耀邦等中央、省、市领导和各界名流的题词、挽联等重要历史文物26幅。丁佑君烈士铜像位于竹根镇文化街茫溪河边，于1958年建成，五通桥市委员会铭文。

丁佑君烈士纪念馆和丁佑君烈士铜像现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川省烈士纪念建筑重点保护单位，乐山市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乐山市党员和干部党性教育基地。

景点链接

中国根书
艺术馆



中国根书艺术馆位于乐山市五通桥菩提山公园的根石家。

2014年11月，占地三十亩，总投资1.6亿元的中国根书艺术馆正式开馆。根书艺术馆，是中国乡土艺术家杨玉冰根书艺术30载沉淀的绽放。杨玉冰在掌握传统根艺创作技艺的基础上，将我国传统笔墨书法融入根艺创作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根书法艺术。作为中国书法和根雕艺术联姻的完美结晶，根书艺术承载了中华古老文明，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集自然“美”与人工“巧”为一体，表达了立体书法的艺术神韵。

中国根书艺术馆为乐山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桫欏
峡谷

桫欏峡谷位于乐山市五通桥区西坝镇，因谷内连片生长着5万多株桫欏而得名。桫欏又名树蕨、蕨树、水桫欏、刺桫欏等，为白垩纪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树种，出现距今约三亿多年，故又有“活化石”之称，被称为“植物界的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谷内空气清新，气候凉爽，岩崖峥嵘，溪水淙淙，令人心旷神怡。桫欏峡谷具有五大奇观，一走进桫欏峡谷，只见几万株桫欏撑起重重叠叠的绿伞，将峡谷荫蔽得幽深迷人。



菩提山
森林公园

菩提山森林公园位于乐山市五通桥区茫溪河畔。山上森林覆盖率极高，林荫蔽日，山峰相连，层峦叠翠，登临山顶，五通桥城区景致尽收眼底。茫溪河、涌斯江犹如两条弯弯的玉臂，轻轻将五通桥城区环抱，水在城中流，城在水中游，岷江如带而东去，西眺峨眉，仙山浮沉天际，南望青龙山，群山逶迤如屏，令人遐想联翩。1985年丁佑君纪念馆在公园落成，围绕纪念馆在公园还修建了“童年真趣”等景点，设有餐饮、茶园、游乐场等配套的游乐服务设施。既是大众游览的公园，也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 四川省革命遗址普查成果广元巡展启动仪式在旺苍县举行 中国红军城、木门会议会址被命名为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10月29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元市委、广元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旺苍县委、旺苍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四川省革命遗址普查成果广元巡展在旺苍县正式启动。同时，省委党史研究室还命名旺苍中国红军城和木门会议会址为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黄如军，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副主任、巡视员张素华，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文星，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唐广生，旺苍县委书记张尚华，省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杨先农等领导出席了巡展的启动仪式。李文星宣读了旺苍中国红军城、木门会议会址两处革命遗址为“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的命名文件，黄如军、张素华为旺苍中国红军城和木门会议旧址授牌。

参加“长征精神与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论文作者，以及旺苍乡镇、县级部门负责人和中小學生共300余人参加活动并观看了展览。

»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荣获“全国社科联先进学会”称号

11月11日，全国社科联第十六次学会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31个省（区、市）社科联、社科院负责人、学会工作部门负责人等160多人参加会议。在会上，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荣获“全国社科联先进学会”荣誉称号。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多年来始终坚持依法办会、依章办会、学术立会，在自身建设、学术活动、咨询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多次受到省社科联相关领导的高度评价。此次获得全国社科联表彰，将进一步推动学会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学会将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省社科联的指导和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下，不断提高学会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学会健康有序发展，为推动我省党史研究工作贡献力量。

» 绵阳举行纪念红军长征入川80周年学术研讨会

9月22日，由绵阳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旅游局协办，“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管理中心承办的纪念红军长征入川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学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晓刚主持会议，各县市区（委）宣传部长、相关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和全市各地的专家共30余人参加会议。来自全市各地的专家、党史研究者围绕绵阳在红军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红军长征过绵阳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传承长征精神弘扬抗震精神等话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 《中共通江执政实录》(2009—2013) 出版问世

12月5日，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纂的通江县第一部执政实录——《中国共产党通江执政实录》(2009—2013)出版问世，全书分为彩插和正文两部分。彩插设“上级领导关怀”、“执政大事”、“执政实践”、“县委领导、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协主席工作剪影”四个部分，共收录图照151幅。正文采取分年记述的方式，按章、节、目进行设置，每年度均设置“县委思路决策”、“重要活动”、“执政成效”、“经验与问题”、“执政大事”等栏目，长约42万字。

» 达州市达川区率先开通党史微信平台

为充分运用网络和现代传媒有效宣传地方党史、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达川区委党史研究室积极探索，寻求多方支持，率全市之先，于11月20日正式开通“达川党史微信平台”。该微信平台分为党建风貌、研究成果、全域达川三大版块，设置党史要闻、时政热点、达川政务、红色旅游、革命遗址、达川交通等十个栏目。经过一个月试运行，得到了市委党史研究室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指导、支持和关心，获得了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达川党史微信号：dzdcqds。

红军走过的大草原（诗组）

文/李瑞琼

亚克夏山

你们，一群革命者
一路跋涉
在彩霞升起的地方驻足

踊跃的绵绵青山
玫瑰漫天 烁烁绽放
惊天的光华顿现
验证生命的不朽

无量的雪山呀
在火与冰的锤炼中
得到了莫测的升华！

月亮湾

从此在这里了
这一串串来自银河波光的脚印
如霰雪一般
与广袤的草原一同成长
在鲜花的锦簇中

腾着八宝彩云的雪山
以另一种精神
将灵魂赠与了草原！

日干桥

谁见过长久的冬天
和长久的夏天？
季节在这里更替
在这里和睦相处

不朽的岁月才是无冕的国王
无论是雨后的彩虹
还是暴烈的雷电

万紫千红中
英雄们年轻的生命已被铸成了绿色

谁认真地想过战争的残酷？
我似乎看见格桑花一样的眼睛
在时空里来回穿梭
如燃烧的烈火
呼吸从未停止

生命的奇迹永远定格
在那庄严的石碑上
以岁月的形式
来完成不朽的年轮！



（作者单位：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

2015年总目录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走在前列 干在实处 努力建设党史工作强省 王承先（第1期）
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性修养的首要任务 李光辉（第1期）
体现八个示范 争做八个模范 永葆党员领导干部先进性 杨劲松（第1期）
革命圣地留下的“赶考”意识 刘全（第2期）
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要修好党史教育这门必修课 刘应兵（第3期）
培育全民法治观念 夯实法治社会建设基础 范斌（第4期）
把抗战历史当作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和“清醒剂” 王承先（第5期）
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的事业成功的保证 江红英（第5期）
学准则 守纪律 以新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王承先（第6期）
领导干部应该多学习点历史——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摘编》有感 陈松（第6期）

全省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范锐平同志关于学习贯彻落实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精神的重要批示（第2期）
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精神，为实现建设党史工作强省目标而不懈努力 王承先（第2期）

本刊特稿

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提升泸州革命老区地位与影响力——泸州革命老区红色资源现状、价值 挖掘及资源转化的思考 曹建国（第1期）
及时跟进 创新举措 全面落实省委对党史工作的重要部署（第3期）
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第4期）

专题研究

遵义会议中的五位四川人 王友平 冯璐（第1期）
四川省三个地方团自发建立及被团一届中执委承认时间考——兼及团一届中执委对王右木一信的肯定和嘉奖 冯铁金（第2期）
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与攀枝花 宁志一（第2期）
四川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斗争及贡献 宋升堂（第3期）
中共广安组织在抗战时期的作用和贡献 林明（第3期）
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抗日救亡活动 颜林（第3期）
用笔锋点燃抗日救亡的烈火——略论《大声》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杨萍（第4期）
四渡赤水与北渡长江——兼论长征史诗的江河元素 宁志一（第5期）
“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浅谈20世纪70年代初陈

云的对外经济工作思想 董振瑞（第5期）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工作 郭生春（第6期）
中共内江党组织对抗战胜利的贡献 余崇威 吉腾久（第6期）
抗战前期乐山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 刘宗灵（第6期）

领袖风采

抗战时期朱德爷爷在太行山上二三事 刘建（第4期）

史海钩沉

战地黄花分外香——记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三坝” 宋健（第1期）
一份抗日杀敌《光荣证》的前尘后世 虎国翔（第1期）
抗日战争时期的“丝绸之路” 魏峡（第2期）
以后得谁读我家书识我文字？——读《陈修文日记（1936—1937）》
钟无末（第2期）
从一封书信看邓小平同志为人处世风格 侯立新（第3期）
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身世被发现的经过 刘仕雄（第3期）
飞虎英烈 浩气长存 李江（第3期）
“莫忘四川”七十年后又说 王皓（第4期）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转战川滇黔 颜林（第6期）
德阳早期工业区建设的曲折历程及其分工协作经验 杨倩（第6期）
三线建设在万源 王发祯（第6期）

资政新篇

严明的政治纪律是党战无不胜的利器——红军长征中反张国焘分裂斗争的历史启示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 课题组（第1期）
四川法治的“正反面”：依法治省必须废立并重加快建设法治文化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课题组（第2期）

人物春秋

一个老红军与老八路的故事 杨军（第3期）
万民永忆女先锋——纪念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诞辰110周年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第4期）
王维舟与延安大生产运动 王荣成（第5期）
朱自清先生在叙永县作抗战演讲 颜林（第5期）

学术动态

四川三线建设概况及研究综述 江红英 赵黎（第3期）
谈《四川知青史》研究与撰写思路 孙成民（第4期）
四川党史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综述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第5期）
动员全川力量驰援全国抗日——评《抗战时期的中共四川组织》 龚自得（第6期）

改革开放实录

20世纪末四川扶贫攻坚（1978—2000）（上） 曾凡荣（第5期）
20世纪末四川扶贫攻坚（1978—2000）（下） 曾凡荣（第6期）

口述回忆

拍摄电影《彭德怀在三线》亲历记 陈文书（第1期）
抗日战争中的四位英雄给我签名合影留念 陈文书（第2期）

编写党史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这条根本原则——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廖志高谈四川党史工作 陈文书（第4期）

文献选刊

发展党的经验与教训——川康特委报告书（节选）（第1期）
严守政治纪律 严明政治规矩 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十项规定（第2期）
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欢送川康出征军告同胞书（第3期）

资料征集

征集珍贵历史资料 重温将军桑梓浓情——叙永县档案史志局征集收藏傅钟将军题赠“叙永县江门中学”校名的亲笔信函 付志强 黄永红（第1期）
成都各界群众欢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2期）
芦山县龙马树的红色故事 骆志勇（第3期）
周总理和一位旺苍籍老红军的故事 蔡勇 张法祥（第4期）

诗画党史

今昔“红军桥” 陈康（第1期）
梦笔山望远（外二首） 王学贵（第3期）
纪念碑——写给抗日战士 唐维扬（第4期）
白山黑水上空的一场大雪——致赵一曼烈士 张合（第4期）
红军走过的大草原（诗组） 李瑞琼（第6期）

工作论坛

增强党史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谢海彬（第1期）
抓重点 铸亮点 努力再创广元党史工作新辉煌 唐广生（第1期）
编纂《执政实录》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滕明雁（第2期）
坚持“三个自觉” 服务中心工作 奋力谱写攀枝花党史工作新篇章 熊伟（第6期）
如何正确认识党史工作 白冰（第6期）

基层手记

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宋升堂（第5期）

红色之旅

宜宾市翠屏区（第4期）
巴中市通江县（第5期）
乐山市五通桥区（第6期）

大事记略

省委大事记（2014年下半年）（第3期）

征文启事

四川党史界开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学术征文活动（第1期）
“纪念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80周年暨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第3期）

动态窗口

省委党史研究室传达学习省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

11月18日，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室务会和全室职工大会，传达学习省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1月16日至17日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王东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全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改革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决定》。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承先要求全室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围绕“两个跨越”、结

合党史工作实际，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副主任李文星传达了全会精神，要求大家迅速展开学习思考，按照“一突出、两跟进”要求，深化对五大发展理念和省委治蜀兴川一整套总体思路和布局的认识和研究，用党的光辉历史和新时期的宏伟执政实践资政育人，为奋力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作出贡献。

省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郭生春向全体干部职工传达了全省产业园区和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会议会议精神。

(省委党史研究室 宣教文献处)

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三严三实”专题学习报告会



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严以用权”专题学习报告会。



全室党员干部认真听取报告会内容。

11月3日，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了“三严三实”第三阶段“严以用权”专题学习报告会。室主任王承先在会上作了题为《学准则、守纪律，以新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党课辅导报告。室副主任李文星向全室干部职工传达了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藏区工作会议精神。四川交投集团藏区高速公路公司工会主席余宗琼、万源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庞军分别就《党史工作对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如何开创基层党史工作新局面》与全室干部进行了交流讨论。省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郭生春主持会议。

(省委党史研究室 宣教文献处)



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三严三实学习资料选编》。



安宁河畔新家园